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漂流王子的心痛录

莱昂内尔·特里林

——从道德看文学

欧洲的陌生人

以书论书

严打之下的“路不拾遗”

大隐隐于市之旧书店传奇

波士顿情书之七

——走，到西街去

冯翊纲

——我是一个学而知之者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晓骥 灵子

轮值编辑

汪伟

观察员

写作: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严飞(美国·旧金山)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凌越(广州)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孙晓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扬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灵子(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2年1-2月 第5卷第12期

总第52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在一个歧见纷纷的时代里，我们做判断的依据在哪里？

本期各位作者提交的报告，涉及到许多著作。评论既是在知识的话语框架内展开，也不可避免地与个人经验掺杂在一起。尽管都是读书人，但对大多数作者来说，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如何安放个人信仰，如何促成社会变化，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更重要，也更迫切一些。不可避免地，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性情和经验去校验知识。这也不奇怪——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参照，该如何判断知识的价值？如果不去和现实事务加以比较，又如何检验知识的真伪？

至于其中的得失，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有什么可堪自慰，也许只有“修辞立其诚”这句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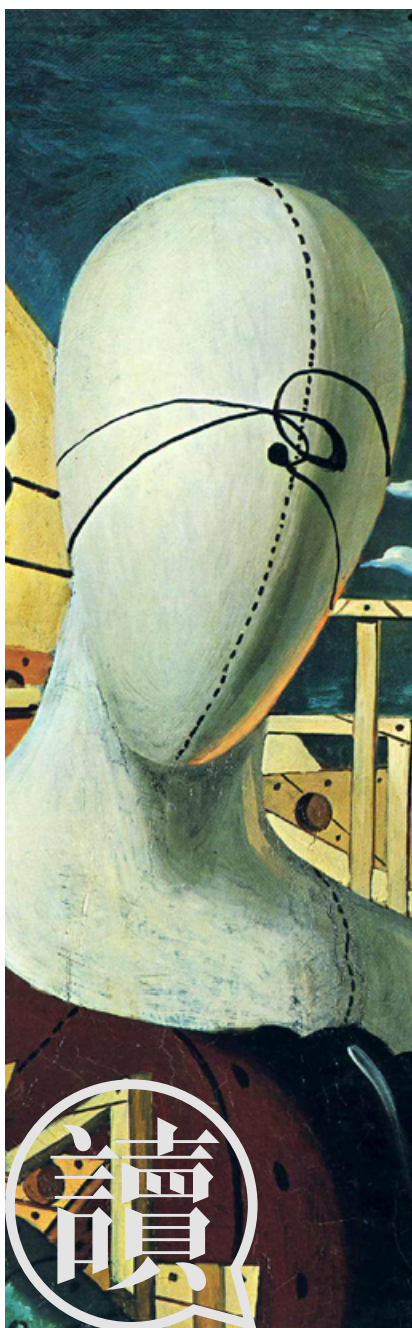


目录

封面用图

LoveSong

Giorgio de Chirico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写作 • 朱航满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001-021

书评

- 刘柠
漂流王子的心痛录
- 凌越
莱昂内尔·特里林
——从道德看文学
- 孙晓骥
欧洲的陌生人
- 严飞
以书论书

022-040

随笔

- 王晓渔
严打之下的“路不拾遗”
- 朱芳艺
大隐隐于市之旧书店传奇
- 罗四鸽
波士顿情书之七
——走，到西街去

041-055

访谈

- 灵子
冯翊纲
——我是一个学而知之者

056-065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此时此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阶层正好处在一个景气下行的时代，一个与企业家价值观有联系的迷茫的时代。中小企业成片倒闭，有些名头的私人企业，纷纷靠拢政府，试图获得体制内资源，只有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他们花着超发的货币，像吃了激素一样，奇怪地生长。可是市场自有市场的逻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都是靠着以制造业为主的私人企业和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国有企业则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他们做的是坐地分赃的买卖。

这可能是眼下最醒目的市场风景。政府和官僚们越俎代庖，把本该企业家做的事情都揽过去了。不仅仅是超发的天量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的运转之中强加了凶猛的货币因素，导致政府的货币、信贷和各种匪夷所思的、不受预算控制的，不受市场监督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把真正的微观经济逼到了墙角。

我最近阅读的著作中，《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赫苏斯·维尔他·德索托，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集中提到了企业家才能的创造性本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产生了三个极为重要的效果，其一是企业家能够创



造出市场以前不曾存在的信息；其二，这个信息通过市场传递开来；第三，企业家行为教育有关的市场主体，调整自己的行为，满足他人的需要。

需要提出一个事实。真正的企业家天生就是一群善于妥协的人，为了利润，企业家首先要和市场妥协，一个和市场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创新，而是愚蠢。其次要和制度环境妥协，一个和政府管理方式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业家分工的命题上，经济学家从来不应该把棍子抽在企业家身上，该关进笼子里的，从来只有政府和官僚。

但是现在，政府似乎成了救世主，企

业家反而悲伤，反而作鸟兽散。这个国家显然才刚刚开始显得有点财富，但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如何瓜分财富竟然成立主流的经济方式；这个时代刚刚对市场经济有一点点懵懂的认识，但是在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拉关系走后门，靠着潜规则赢取财富，似乎比市场的逻辑更符合逻辑。要命的是，似乎民众对这样的经济态势热烈欢呼，民粹主义和均贫富主义以一种道德的姿态出场，他们首先找到的敌人，竟然是市场和企业家，以及为市场和企业家说话的知识分子。

人们似乎永远不会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企业家没落了，如果市场停滞了，那么民众的末日就要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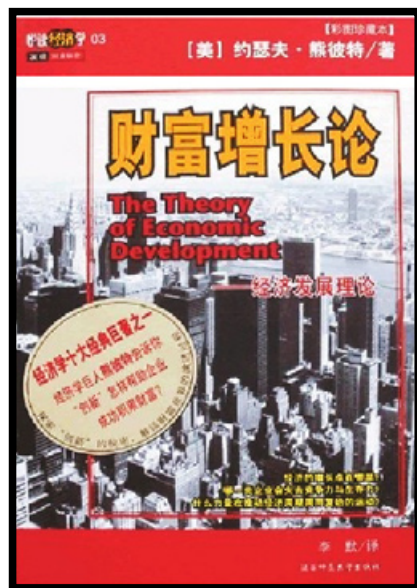
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任何特色性的陈述，任何差异化的坚守，都只能在市场的逻辑之下进行。因此，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就显得如此重要。按照熊彼特《**财富增长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中创新理论的描述，我们的企业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开始创新，就放弃了创新的方法论。创新并不等同于发明，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过程。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创新把现有的生产能力用于新的用途，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创新将会导致新的商业领袖的崛起，并构建一种崭

新的人类生活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征象，已经不太可能支撑新的商业领袖的诞生，而生活方式全面向公权力转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可是熊彼得说得很坚决，创新(innovation)是个纯经济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creation，这等同于知识和资源的重新组合(new combinations)，而从事这个重组活动的人，只能是企业家，无论是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或老产品加入新元素，无论是引入新的生产或贸易方式，开辟或进入新市场，无论是找到新原料或投入品，抑或是引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都只能是企业家。

只能是企业家，言下之意是，即使再伟



大的政府，再伟大的官僚，也做不了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的官员们并不在乎这些理论的价值。前几天与友人聊天，谈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在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要害部门的推动下，似乎越来越不太考虑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众人思考最多的，竟然是怎样把海量的资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标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资，而不是实现了多少利润。

这听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但的确是事实。国家财政财大气粗，国有企业岂有不铺张的道理？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历史里看，情况可能不那么美妙，因为有些历史已经显现出它的结果，虽然今天很多人依然不愿意正视历史。

纯粹从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看，失败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典型的国有企业运动，其结果是让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为继。有意思的是，晚清政府的垮塌，却导致被遮蔽的市场开始勃兴，由于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经济力量得以萌生。这正是被史学家反复称道的“黄金时代”的来由。1911年到1937年，这大约25年的时间，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发展豪迈，不仅在商业领域，在很多实业和工业领域，也实现了同步发展，并诞生了一批在今天看来气象宏大的中国企业家。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有著作在此，《**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详细呈现了这一个时期的经济景象。与晚清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机理类似的是，黄金时代同样没有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主导、保护和支持，在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处在弱勢的地位，表面看上去是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支离破碎，但正是这种破碎的局面，给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史学家叶孔嘉整理出的数据显示，这一段经济的自由生长的确蔚为壮观，每年竟然保持在8%—9%的速度。

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迎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事实并非如此。1927年值得后人分析。这一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基本稳固，官僚经济开始上演。侯家驹先生在他的《**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7月）中，也是反复陈述中国经济绵延几千年的管制特征。

白吉尔也持守这样的分析框架，把1911—1927年称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自主企业时代，把1930—1940年称为“统制经济”时代。这个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正是被当时的人们热捧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有意识地从德国和苏联学来国家机器以行政力量来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他们坚信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到30年代中后期，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很快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抑制了民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把洋务运动称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第一次“国进民退”，那么民国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主导的经济发展，就是第二次“国进民退”。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政府与企业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导公共领域，企业家主导市场的推进，这是最核心的经济学理念，原因在于，只有利益导向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到市场迂回的分工体系里，而政府因为行政权力的色彩，不可能维护市场的自发秩序，相反，政府的过度介入只能导致市场分工的粗糙与片面。由此，企业主导的分工就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体系里，而政府主导的经济则只能形成一些小众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层面的“私人俱乐部”。

“私人俱乐部”名称，来自经济学家

德·索托那本著名的《**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这类似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陈述的“权贵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抵制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沿着这种糟糕的体制摸索。当这种现象出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史史料。台湾的经济思想史家赖建诚先生的《**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也在反复陈述这样的经济现象。读完这样的著作，就会生出这样的感叹，人啊，你可以借助无知的名义来抵挡经济学的理论，但你却不可能让自己彻底走出历史，因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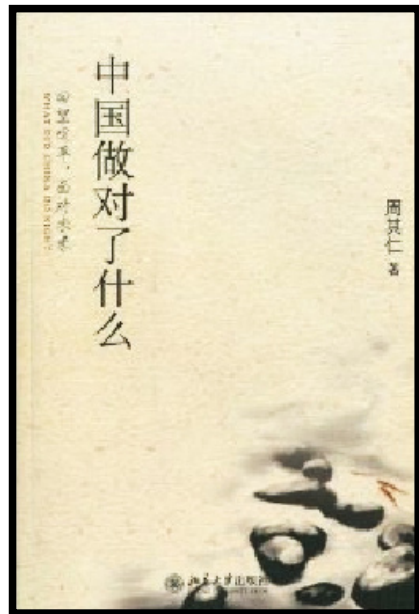
的确，中国最近200年的经济史叙事，让人唏嘘。市场经济获得相对发展的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对薄弱乃至破碎的两个时期。一旦政府权力回复重建，可以逐渐发挥强有力的社会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过公共管理的边界，把大手伸到企业和企业家的头上，收缩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扩展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力量，做大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地盘。当这样的逻辑发展到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政权，终于让民间资本主义的力量彻底绝迹了。

好在我们还有1978年。

周其仁教授的著作，《**中国做对了什**

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 他认为邓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 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经济生活中, 以及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就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历史。从1978年开始, 政府管制能力开始大面积退出, 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 这本质上就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确认。至于邓小平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 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 都可以沿着分工的命题予以分析和阐释。

从经验的层面看, 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 基本上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 只是在节奏上采取了一种更加保守的渐进式思维模式。但问题在于, 2008年来了, 这一年的秋天, 全球金融危机骤起, 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更加凶猛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 所谓主导, 事实上就是控制, 就是做大国有企业, 消减私人企业的市场容量。今天的中国, 任何一个观察者都能看到, 在诸多关键的产业上, 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说银行金融系统, 土地资源系统、能源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运输系统、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来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资源, 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新经济信息产业、文化传媒业, 甚至包括房地产业, 都被政府之手超级垄断。大量的超发货币流入这些国有企



业, 再一次推高了国有企业的垄断能力。这已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一种经济的惯性: 正是有这些战略制高点的政府控制, 中央一级的大型国有企业才可能越做越大, 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中国的几大金融类国有企业, 竟然登上了全球500强企业的头几名。

此情此景, 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度”国际比较指标提供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 2011年度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是51%, 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名, 综合自由度大致与俄罗斯50.3%、越南49.8%、老挝51.1%、孟加拉51.1%、阿根廷51.2相当, 显著低于中国台湾70.4%、韩国69.9%、日本72.2%、中国香港89.7%。这正是中国企业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醒目的国进民退浪潮。历史会

再次重演吗? 历史推进到今天, 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晚清政府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官商结合的发展悲剧, 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民国时代“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政策悲剧, 如果不沿着1978年之后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继续深化, 那么我们将真正进入一个市场经济与企业家建设双重蒙昧的时代。

当然,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假设, 因为这其中隐含着对历史的无知, 对未来的狂妄。丁学良先生在《**中国模式辩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9月)中, 坦诚中国的企业发展模式, 不应该是威权体制和社会管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扩张与私人企业退缩, 不应该是政府对市场实现一种越来越严厉的限制, 而应该是相反,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的普遍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 最近, 人们听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言说, 他说今后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利好消息, 由此, 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信心, 也有理由增添一些。○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

在即将告别2011年的时刻，木心先生，我喜欢和尊敬的一位写作者，在他的故乡乌镇长眠。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的惊讶和伤感便是，永远也读不到这个独特而非凡的文学写作者的任何一篇新作了，这可能是2011年文学上最令我感伤的事情了。的确，对于极少的一部分的写作者，我总是满怀期待，阅读他们的新作就像一个“苹果”的爱好者们疯狂地抢购IPONE5的售卖一样。那么，2011年，我期待过哪些著作，在记忆里，我似乎为读到缪哲的《祸枣集》而高兴，为读到董桥陆续出版的随笔集而兴奋，为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增订本出版而赞叹，为读到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而会心一笑，也为一本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作者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而奔走相告，还有赵越胜的《燃灯者》、刀尔登的《七日谈》、李静的《捕风记》、止庵的《比竹小品》，等等。这些著作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让我看到了2011年汉语写作的独特风景。当然，还有很多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的零篇散章，也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写作的真实存在。因此，我郑重推荐花城出版社的《**2011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1版），它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恰恰弥补了自己可能难以领略到的风景。在2011这样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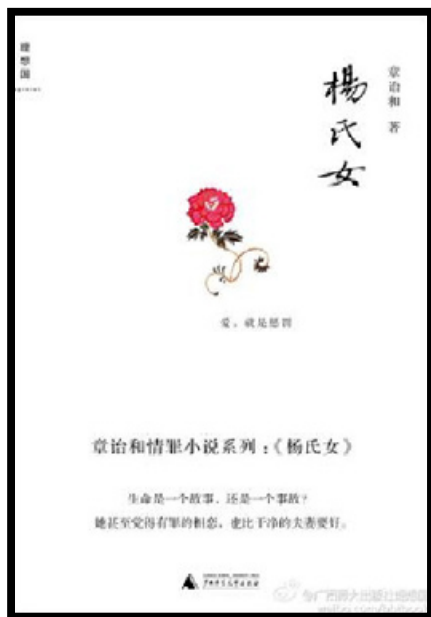
平庸的年份，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阅读，似乎才显得我们的文学写作，并不那么地暗淡和寂寞。

给随笔一个明确的定义，似乎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诸如散文是吗？小品是吗？ESSAY是吗？杂文是吗？笔记是吗？论文是吗？都是，或者都不是。这对于一个编选这样一册年选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对于李静的佩服，便是她对于自己的选择标准总能找到一种独异的通道来予以解决，诸如在2011年的这册随笔中，她这样评价自己编选的这些随笔，“文字是钉子，钉于意识之樯，固着那些不愿被遗忘的事物。”她自己所编选的这册著作，便是这样的东西了：“一本书，是钉子及其固着物的集合，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它们的图案。那是一个时代小小的精神侧面。”由此，不难发现，在这册随笔年选中，诸如耿占春的《沙上的卜辞》、秦晖的《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李庆西的《犯傻、装傻与博傻》、王小鲁的《“新游民”电影》、崔卫平的《人在做，天在看》、文钊的《7·23悲歌：伊伊，等你长大的时候》、高尔泰的《隔膜》、刀尔登的《读史六则》，等等，莫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屏障的一枚枚钉子，它们尖锐、独立、深邃。

果然是研究戏曲艺术的专家，章诒和

写起小说来，还是依稀可见戏曲的底蕴。小说《杨氏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1版）有引子，有尾声，故事分上下两编，上编11节，下编8节，犹如中国古典戏曲的长篇折子戏一样；更美的是她笔下的语言，也分明是戏曲的味道，韵味十足，华丽如诗，诸如写女主人公杨芬芳和丈夫刘庆生一起去上海，在火车上还思念着她青梅竹马的情人何无极，“朦胧之中，何无极踏着五彩祥云，披着万道霞光从天而降。”仅此一句，杨氏女的心情以及随后的情节发展，便都尽在情理之中了。当然，还有小说的内容，章诒和的东西一贯矛盾及冲突强烈，人物命运大起大伏，悲欢常让人不胜唏嘘，这部《杨氏女》，依旧如此。她上编写杨氏女被嫁给军人连长刘庆生，还念念不忘青梅竹马的何无极，最终导致悲剧，由通奸杀人上升到反革命阶级复仇，情人被判死刑，自己也被劳改二十年；下编写杨氏女在劳改农场里，被指导员孙志新勾引，导致两次引产，最终事情败露，孙志新被开除党籍和调离农场。小说中的上半编，偷情如游戏，热烈似火；下半编，野合似做贼，冷冽如冰。杨氏女的命运，仿佛一只大海大浪中的孤船，随风飘荡，处处碰碣。

古典戏曲里可多是大团圆结局，章诒和深谙此道，但小说《杨氏女》，却几乎是悲上加悲，读后让人久久怅然。并非因为只是研究过戏曲，所以懂得中国戏曲的软肋所在，乃是她自己实在是积怨太多，大团



圆和喜庆的东西，恐怕即使是逼迫，她也难以写出来一丁点的。章诒和出身名门，父亲是民盟的主席章伯钧，文革中被打倒，成为“头号大右派”，而章诒和自己，则也因言获罪，狱中服刑多年，受尽了磨难。她大半生研究戏曲，那些舞台上的名伶以及剧本上的故事，都成为她晚年写作的重要资源，岂能不吐不快。仿佛如火山喷发，她实在是积蓄太久。洛阳纸贵的《往事并不如烟》与《伶人往事》等著作是纪实，她写上层贵族，写一介书生，也写台上优伶，但底子里依稀还是个人的身世和往事；随后笔触又一转，虚构小说，去年的《刘氏女》，今年的《杨氏女》，还有接下来的《邹氏女》，一系列情罪小说，都是她在狱中的见闻，内容很艳，但不俗，章诒和真聪明，知道读者喜欢什么。难得70岁的人了，还这么有激

情。不过，她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也同样是时代缩影的典型一例。因此，即使是小说，也是虚实相映，如梦似真。

台湾作家杨照早年有个朋友H，居住在台湾的淡水河边上，生活贫穷，身体糟糕，他学习化学，却梦想做个诗人。杨照将与他谈天作为自己最快乐的事情，H曾告诉杨照，巴金的《随想录》与里尔克的诗歌一样伟大，因为巴金在“用自己的生命实存一个观念”，后来他还告诉杨照：

“Cher Ami，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会弄不懂呢？书承载观念，所以才能改变人，才能改变历史。然而书不能只承载观念，只有观念的书，是暴君是独裁者，讲观念的书，要有故事要有生活，大量的故事大量的生活，这样才能保证书中传递的观念，是软的不是硬的，是动的不是静得，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在其他无聊的书上，却太少读这种真正重要的观念之书了……”H的这番话，让杨照永远记得那天傍晚的落日夕阳，也不会忘记他脸上流露出的一种特殊的骄傲。

淡水小楼上的谈话，对于青年杨照的影响十分深刻，后来他完成了著作《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目的就是要“重新整理、认知、定义我们生活中的观念，调整其方向与轻重”，这本著作在大陆出版被改名为《故事照亮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1版），副题便是“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因为观念“是让未来



能够变得美好”。在这本著作中，杨照以讲述故事的方式阐释了现实社会中100个重要的观念，诸如爱国、选举、战争、和解、政绩、协商、历史、怀旧、开放、法律、诚信、未来，等等。在这种讲述中，杨照始终没有忘记朋友H的忠告，他试图以诗意与柔软的文学方式，也以旁征博引的渊博与幽默，更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与积极，在我们熟知的故事中寻找一种令人惊异的陌生与兴奋，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那些熟见的观念，以及他们可能存在误导之处。因此，杨照的这种写作既是里尔克式的，也是巴金式的，他是写给台湾社会的，但我以为，他更是写给整个华人社会的。

春节期间，我与老师陆文虎先生一起去拜访了杨绛先生。杨先生思维清晰，言谈幽默，我们不时被她谈到的话题所逗笑，



诸如谈到春晚、谈到广告、谈到美食，还有养花、书法、计算机、养生、健身，等等。说起自己的健身，杨先生谈性甚浓，她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八段锦，她说这是钱先生生前教给她的一种运动方式，现在每天都要在家里锻炼，说着便一边为我们背诵锻炼的口令，一边在座位上示范了起来，一招一式都是非常的专业和认真。她还说现在自己

身体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心脏有衰竭的情况，但转眼她就向我们调侃说，老年人得这种病最好了，既不痛苦，也不传染，还特别干净。如果自己快死了，便躺在床上，谁也不打搅。大家被她的幽默和开朗逗得大笑。最后，我请杨绛先生为我带去的一册《我们仨》签名，杨先生字迹清晰，娟秀有力，看笔力，哪里像是101岁的老人。

杨先生的著作我存有很多版本，从单行本、精装本到文集和选集，都不止有一套，而这册有先生签名的《我们仨》（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7月1版），自然是最珍贵的了。我的这册杨先生签名的《我们仨》，是2011年4月新近印刷的版本，距离2003年7月的第一次印刷，已经是第33次的印刷了，总计印刷达到了744000册。真没想到，杨先生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和知音。陆文虎老师还曾向我讲到，去岁她去拜访杨先生，得知她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内容与小说《洗澡》相关，据说书名是《学习图书馆学》。我们都很惊讶，先生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骄傲。Q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今天的中国人还有信仰吗？每每有逾越道德底线的社会新闻发生时，公众不禁都会追问同样的问题。从常理上看，如若国人有信仰，至少在平均道德水准上的表现，不至于如此频频地触及良知底线；但若说国人无信仰，我们却又同时看见道观、寺庙里香客如云，祈福求财者云集，在他们心中，分明存在另一世界与神秘的力量，否则何苦香烛频举，磕头连连？

但是，要观察中国人的信仰观，或许还是不得不从这看似悖论的景象中入手。早从17、18世纪开始，欧洲的传教士就对中国人的信仰观迷惑不解，莱布尼兹认为中国人相信神灵，但另有人却说中国人其实只是常识理性的民族。后世学者则据此将中西信仰之争划分为“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以此表明，国人的信仰逻辑与西方并不一致，难以用西方人格神的模式来为中国信仰观定下标准。

在上期推荐的《王阳明》一书中，秦家懿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良知与万物一体，确是阳明悟得的学说；它也代表阳明已到达的悟境或超然心态。我这里指的，是所谓神秘性(mystical)体验与领悟。”正是从这一“神秘性”的角度，中西信仰似乎才寻觅到一条可以比较的标准。如阳明心学的良知说，到底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



论述，或是孤傲不羁的大言炎炎，还是另有其他今人难以理解的玄妙之处？

在秦家懿的另一本名著《朱熹的宗教思想》中，她同样也指出，尽管朱熹与王阳明处于两条不同的儒家脉络里，但是他们在寻找“道”的神秘性特质方面，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不过，在科学话语占据公共领域的今天，讨论“神秘性”的确相当棘手且易误入歧途。姑且不论“神秘性”的体验难以分享与普遍化，只需看看今日民间信仰的“神鬼化”色彩，便可了知“神秘性”一词背后，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正是因为儒家传统中“道”的神秘性维度，才让儒家的“圣王”政治传统历代不

绝，绵延至今。但也正因为“道”于常人而言难以把握，则让“道”与政治的结合常常会令人云山雾罩，难识真容。刘小枫先生的《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辩证》（三联书店，2012年1月）就是这样一本试图讨论“圣王政治”的著作，如其旧作一样，此书依然表现出“隐微式”的写作风格，不过此书的确牵出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议题，儒家思想历数代而增删削补，孔子的真义究竟为何？

从“道”的层面来看，熊十力晚年的《乾坤衍》可谓定调之作，他以《易》来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基础，认为孔子本意是将儒家建立在《易》的宇宙论基础之上，此宇宙论的特色为“体用不二”，万物皆含实体，由此汇同为宇宙实体，而且因此实体内含“健顺”二性，故可生生不息，孕生万物。初看起来，“体用不二”与佛家并无差别，但熊十力显然将佛家归为“寂灭”一派，认为佛家最终导致对此世的远离与弃绝，而儒家则是与宇宙的生灭不息共沉浮，以此实现经世的政治理想。

显然，刘小枫先生对熊十力的形而上学根基究竟有何得失并无太大兴趣，他的目标仍然是现世政治，如他说“佛家若拐走儒教国家的众生，儒生就绝不能坐视——说到底，‘众生皆有佛性’的宗趣拆散了中国固有思想中原始的道儒一体。”这句话无意中透出了此书的底色，即前半部论韩非子，是想依靠熊十力发展的形而上学来清



洗韩非的道家底色，从而为“法家”正名，并在后半部则将熊十力的辟佛来为儒家的“圣王政治”扫清道路。这种解读，是否符合熊十力的本意或许尚需认真辨析，但此书的文外之意却大抵在此了。

由此也催生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今日之新儒家，除开“讲政治”的面向外，到底能接续儒家的哪一路精神传统？熊十力以《乾坤衍》一书作为其新儒家体系的收官之作，未见后人循此传统继续发展，而其弟子牟宗三以不同于宇宙论的“心性论”理路建构新儒家的形而上学，此一脉络至今也渐告衰微。无论是宇宙论还是心性论，之所以对于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意义，是因为这涉及到儒家对人性、宇宙的本质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与说明，假如阙失这一基础，那么在此之上所建构的任何“政

治”方案，将会变得有如无根的浮萍，随波飘荡。

秋风先生的大部头著作《**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试图从宪政角度来为儒家的复兴作一番历史与现实的阐释，笔者无能力对此书作出公允的评价，但是却想指出的是，仅仅从制度层面来重新理解与诠释儒家，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却难以解决儒家的真正危机，假如不从人性论，乃至宇宙论角度来为儒家作一番说明，儒家充其量不过是具有“政治性格”而已，而绝对谈不上一种可以与西方对话的文明系统。就在最近，张灏先生在台湾《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儒家与政教关系》的文章，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来，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一直存在着“政教一元”的道统，其基础就是受宇宙王制观与天道观影响而形成的天命说。如果儒家道统一直都建立在此“政教一元”的基础之上，那么割裂“政”与“教”势必不符合儒家之精神，其构造的儒家宪政史脉络或许也需受到相当的质疑了。

在今天，左翼批判知识分子对“政教一元”当然持有天生的敌意，但这常常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即将“政教”分离的同时，常常也会将“教”的部分粗鄙化与世俗化。许多知识分子在评价其他文明与宗教时，常常表现出无知与粗暴。如在汪晖先生去年出版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三联书店，2011年5月**）中，首先将西藏文化狭隘地定


性解读为一种欧洲式的“神智论”与“神秘主义”，而根本不对藏传佛教的内涵作任何严肃的梳理，在描述完西方世界中的西藏形象后，就仓促地将西藏问题归纳为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问题。由此，藏传佛教及其文化中的核心诉求部分反倒被遗弃一边，成为“批判性知识分子”任意取舍的意识形态原材料而已。这种只讲“政治”，不讲“文明”的思路，已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某种主流趋势。

更让人感觉不解的是，汪晖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化固然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但是却形成了一种“政治与信仰之间的新的合一形态”，而市场化的激进世俗化则为宗教的扩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空间，正是这一空间，为西藏的特殊文化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某种普遍的平等政治身份才可能缓解这样的特殊文化认同之争，由此，西藏问题在汪晖看来，不是依靠“文明对话”，而是要依靠社会主义的政治身份资源去作整合。问题是，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过往的历史经验难道还不够吗？

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文明”要素，如今越来越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出版的一本由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论文集《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1月）就是试图从“文明”角度来理解国际政治的博弈，至少这本文集代表了这样一种意图，即不再强调

国际政治领域里对暴力与现实主义的绝对崇拜，而是认为“文明”其实削弱了这种权力逻辑，但是多元文明论的产生，也同时开始挑战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如何看待“文明论”与普世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都将是关系到未来这个世界往何处去的主要议题。

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究竟该何去何从？在“中国模式”日益盛行的今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文明究竟有怎样的期许？我们还拥有哪些可资对话的文明资源？从这个角度上看，传统的复兴其实与学习西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皆不能偏

废。毕竟我们今天其实并无传统可继承，也对西方所知甚浅，分明是站在一片老宅的废墟之上举目彷徨，地基尚待清理，砖瓦还需烧制，就如狄百瑞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一种新秩序不汲取过去的遗惠是能够持久的；但是也没有一种传统，无论是儒教的、佛教的或基督教的，在全球斗争的经验中是不加改造就能生存下去的。”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最近很多出版社影印民国教科书，大有“拣到篮里就是菜”之势。但是，民国亦曾是党国，1928年之后全面推动“党化教育”（美其名曰“三民主义教育”），此后的教科书不乏斑斑党化痕迹。

我最喜欢的民国教科书是1912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去年读库影印《共和国教科书》时将该书收入，可惜均为套装，并不零售，且售价数百元，难以普及。最近由南方周末编选、读库设计制作的《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2011年12月），定价58元，更为亲民。

这是近乎理想的公民读本，讲到平等，“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讲到自由，“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整整一百年后，大学师生的常识与当年小学生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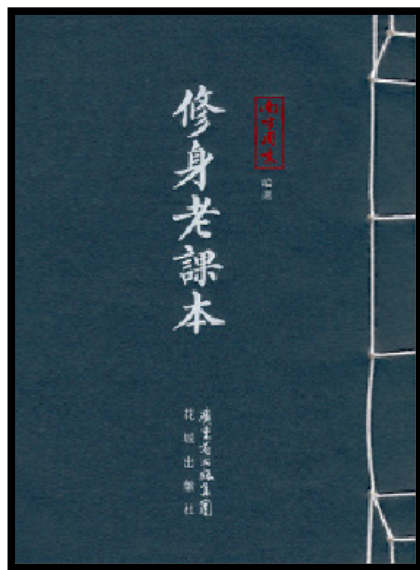
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主持“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俞晓群先生，到了海豚出版社之后重新发力，重印了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幼童文库》，已经出版两集，每集十册。

如果吹毛求疵的话，这套书出版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同时期的教科书一样，已经开始有党化教育的痕迹。比如在《聪

明的孩子》里，讲到曹冲、王戎、司马光等之后，最后出现一位“陈英士”：

陈英士是个革命伟人。他小时候，有一天，和小朋友到野外去，烧树叶玩耍。有一个小朋友，烧着了衣服，别的小朋友都吓跑了。陈英士很聪明，推倒那个小朋友教他在地上滚，把火滚灭了。

陈英士，即陈其美，同盟会中坚。这段文字是典型的“党化神话”风格，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种内容所占比例极小，在整套丛书中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幼童文库》依然适合现在的幼童，或者偶尔想回到幼童时代的成人，比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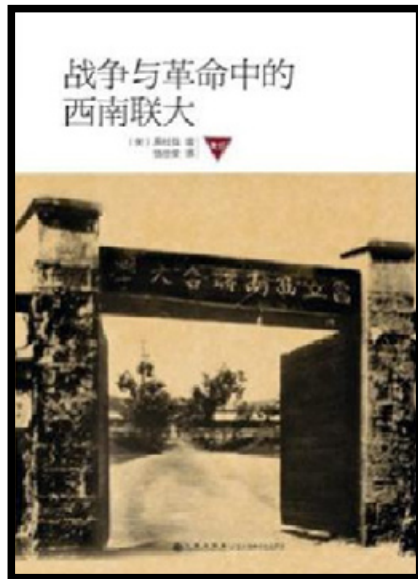
虽然国民党从苏联那里进口了党化教育，但是推行没有那么彻底，知识阶层也秉持职业操守，以致在党国和外寇的内外夹击下，依然会出现西南联大的传奇。但是，西南联大不应仅仅是一个传奇，靠一些佳话来支撑，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它的理念和精神。

美国学者易社强先生用二十年时间，研究这所存在不到十年的大学，对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理念和个人主义的精神做出了完整、清晰地呈现。同时，他还指出，拒绝党化的西南联大在历史中却被党化：“共产党制造了一个神话，即联大的核心精神是在中共领导下塑造起来的。”

这本《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能够在内地出版，纯属意外。更意外的是，几乎未作删节，只是增加了一些引号。作者还著有《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期待这本书也能早日在内地出版。

吴晓波先生和柳红女士的笔墨官司持续经年，我个人更为认同后者。但是，这不意味着以人废言，吴晓波在新著《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里的一些观点值得重视。

关于国史的著作很多，历史学家常常限于虫鱼之学，缺乏经济学和法学常识。幸好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弥补了一半缺憾，但是这本书比较学术，读者有限。吴晓波以自



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立场，对两千年的国史望闻问切，写下一份中国企业史的“病历”，通俗易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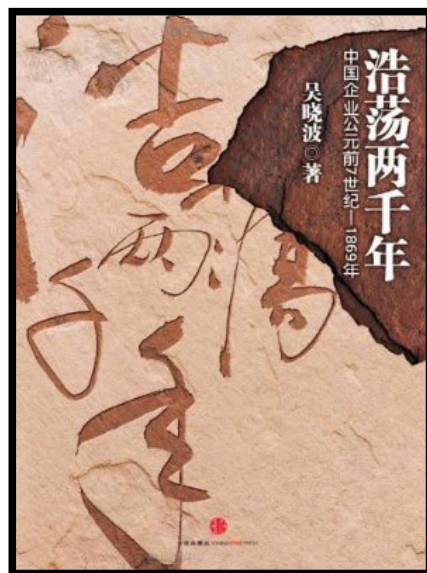
在前言里，吴晓波明确指出：“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诊断出病理之后，就会发现商鞅、汉武帝、王安石等等的政策，非但无法药到病除，还会产生饮鸩止渴的悲剧。

在《浩荡两千年》里，商鞅变法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汉武帝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王安石这样的人物“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

这些评判与熟悉的说法截然不同，却

绝非故作惊人语，而是有着坚实的价值和逻辑作为支撑。对商鞅、汉武帝、王安石们的批评，从他们颁布政策之时就未曾停止，只是在后来以国家主义为宗旨的历史中，那些批评的声音被归为“别有用心的小人”，轻松抹去。

如果对这些历史中的“鸩酒”没有辨别能力，在现实中也会晕头转向。只要熟悉了商鞅的模式，就不会等到王捕头闯进美领馆才明白“打黑”原来是“黑打”。可惜当年秦国没有六国领馆，否则商鞅或许可以捡回一条性命。📍



漂流王子的心痛录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驻东京的各国外交官和情治人员，正在热读一本书：《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此书于1月19日紧急出版，首印3万册，很快售罄；10天之内加印到第4刷，发行15万册，势头超过两年前村上春树的《1Q84》，成为年内第一大畅销书已基本无悬念。据作者透露，该书韩文版不日即将推出，英文版正在紧锣密鼓地翻译，大陆以外的中文版事宜似亦在交涉。

如此之猛的出版“异象”，宏观而言，折射了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无奈与焦虑；微观而言，从读者的构成来看，女性读者占了三成，而过去关于朝鲜问题的书籍，绝大部分为男性读者。巾幗的登场，被认为是因为该书充满了类似韩剧家庭中家庭骚动的要素。同时，对东洋文化情有独钟、曾多次持伪造护照偷渡日本的“寂寞王子”金正男身上的“人间味”，不仅成功颠覆了此前被媒体妖魔化了的形

象，而且，在众多女性读者的心目中，开始形成某种类似裴勇俊似的偶像光环。连他过去喜欢光顾的东京的饭店、酒吧也跟着沾光，想不火都难。

还有一点需特别指出的是，尤其是对诸如外交官、情治人员等“专业人士”来说，该书的及时性和时效性显而易见——金正男与作者最后一次通信是在2012年1月3日，这无疑是解读朝鲜国内形势和高层心态的“现在进行时”文本，其弥足珍贵自不待言。

在澳门、北京的三次访谈（累计超过7小时）和逾150封以上的电子邮件通信构成了书的主体，作为日主流大报政治记者、资深朝鲜问题专家的客观描述和背景解读穿插其间，既有坐过山车般的惊心动魄，又不失知识性的连贯，读来张弛有度，饶有趣味。

2004年9月25日，时任《东京新闻》驻北京特派员的本书作者五味洋治在首

图为齐奥朗

都国际机场，等待来京出席关于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日朝交涉的朝方首席谈判代表宋日昊抵达，却不期然邂逅了乘同一航班抵京的金正男。以次为契机，开始了与金正男的通信。

从通信，到通信中断（长达6年之久），到恢复通信，直到在澳门、北京的面对面接触、采访，乃至在北京某个象征中国发展成就的顶级高层酒店的顶层酒吧深夜喝酒，不仅初期对金正男身份的怀疑完全冰释，且作者得以最大限度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在探求这位长期羁旅海外的漂流王子身世、经历的众多谜团的同时，力求窥视朝鲜这个对外部世界来说密如铁幕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政治游戏规则及民众的生活实态。毕竟，朝鲜之成为“普通国家”，有必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其真实面目，而澄清围绕第一家族——金正日家族（Royal Family）的种种传说，则是建立朝鲜“镜像”的第一步。对这种努力，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仅从目前披露出来的情况看，便不乏令外界相当错愕的内容，如金正男亲口告诉五味，因住处不同，他与二弟金正恩从未见过面；与大弟正哲见过几次，却是在海外。

正男对其父的感情很复杂，混杂了尊敬、失望、恐惧等各种情愫。作为长子，留学时代的正男，在海外度过了自由的时光。但回国后的“叛逆”，却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从而不仅缩短了弟妹们海外留学的时间，而且使他们与当地友人的交往等行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正男回国后，



五味洋治

《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
（「父・金正日と私 金正男独占告白」）

（日）文艺春秋社

2012年1月19日第1版

很苦闷，“每晚泡在高级饭店的酒吧里喝酒，造成了一些麻烦，也曾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作者认为，正是“基于自身的海外留学经验，从少年时代起，便目睹西方诸国发展的金正男，是北朝鲜少数的开明派”，“在其父绝对权力笼罩下的北朝鲜，（金正男）是对国家应有的姿态提出疑问、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向父亲一路谏言的唯一人物”。多年来，金正男对朝鲜政治的进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接班人制度问题，二是关于经济的改革开放问题。对前者，他虽然从理念和出发点上，反对三代世袭（“三代世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同时也承认其父最终“不得不”推动该措施的现实合理

性（“之所以做此选择，我觉得是因为存在北朝鲜特殊的内部要素”）；对后者，他认为，“北朝鲜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同时推进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做法”。

金正男与五味记者通信最频密的时期，是2010年年底。彼时，金正日正式确立了接班人，正男对此痛心疾首。一方面为了表达自己一贯的对三代世袭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以期在未来可能的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正男对方方面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认可了作者的出版计划。他显然把五味记者的采访及两人的通信，作为自己唯一的信息发布渠道，借此维系对朝鲜国内及国际社会的“互动”。

金正男礼仪周到，有信必复。且基本不回避问题，对那些一时难以答复的敏感问题，则明示不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贵为“王子”，他却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且从来不吝表达，如对作者在生病时的问候，对日本震



后核辐射问题的关切，等等。虽然就事论事地说，此采访项目在本质上是西方媒体的政治记者对政治人物的采访，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得，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对笔者来说，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读毕此书，真有“一卷读罢头飞雪”之感。漂流王子的真情告白，即是金正男个人的心痛录，又不失为一把理解朝鲜国内现状的钥匙。📖

莱昂内尔·特里林

——从道德看文学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 iamlingyue@yahoo.com.cn)

二十世纪中期，在有左翼色彩的著名刊物《党派评论》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批评家，他们大多居住在纽约，因而也被便利地称为“纽约知识分子”，包括莱昂内尔·特里林、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莱斯利·菲德勒、玛丽·麦卡锡等，他们以极具活力的前辈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为榜样，强烈反对当时

在美国高校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批评把文学与社会和政治分离的倾向。他们认为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复杂解析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以此与强调文本内部分析的新批评区分开来，尽管在美学观念上两者仍然有某些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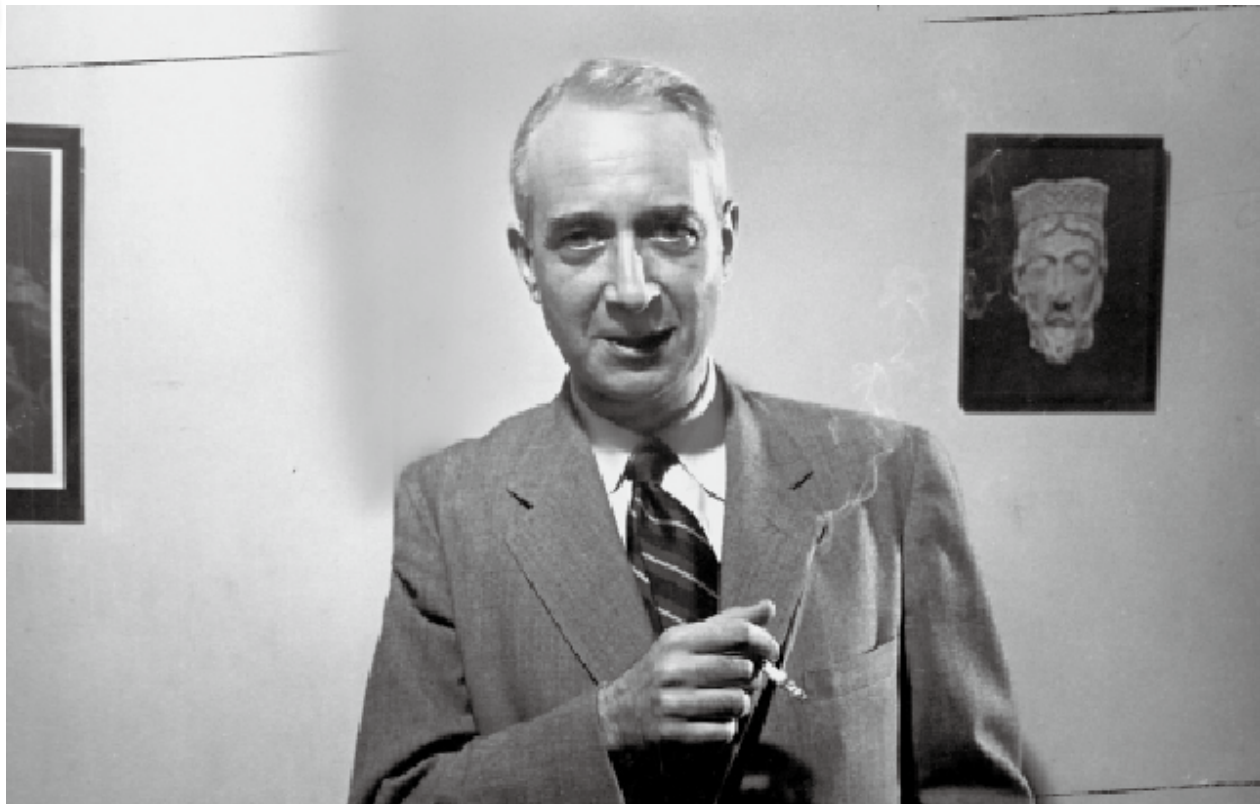
特里林是公认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特里林是犹太人，1931年26岁时受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讲师，自此特里林在哥大执教44年，直至1975年去世。特里林的一生没有经历过多少外界的变故，但平静的生活显然有益于潜心研

究，并最终使特里林成为研究人类内心事件的权威人物。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眼界狭窄，被西方流派迭出的理论研究闪花了眼，反而对威尔逊、特里林这样以文风优雅著称的批评家缺乏足够认识，其标志就是对他们作品的翻译严重滞后，只是在近几年才陆续见到他们作品的中译本。今年译林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特里林的两本书——《文学体验导引》和《知性乃道德责任》，加上200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特里林晚期名著《诚与真》，特里林在中文世界总算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而他的著作本身的生命力，依然会给现在的读者在认识文学的复杂性和柔性方面带来启发。

特里林和威尔逊

莱昂内尔·特里林是典型的美国文



人，在许多方面和另一位批评大家埃德蒙·威尔逊可谓同道中人。他们同为文学的细致观察者，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甚至主观上规避某种单一的理论体系的涵盖。他们都乐于为媒体撰稿，威尔逊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新共和》、《纽约客》和《纽约书评》杂志上，特里林学术生涯的早期时常为《民族》和《新共和》撰稿，稍后则成为《党派评论》的核心撰稿人，因为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群，这使他们的文章在文风上有别于那种学术术语满天飞的学院派论文，而是有着随笔化的倾向，——不消说，这样的文章更耐读也更有文采。他们的文学批评都扎根于十九世纪的文化传统中，特里林第一本专著即为《马修·阿诺德》，他在文章中曾数度引用阿诺德的名言——文学乃是对人生

的批评，而某种程度上特里林所有的文学批评也是围绕这句话展开；威尔逊则在《到芬兰车站》——一本精彩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的著作——一书中对法国19世纪的作家法郎士大加褒扬，并对法郎士逝世后其在法兰西学院的继承者瓦雷里抨击法郎士的作为颇为不屑：“象征主义者相信社会孤立，甚至连一点改造社会的幻象都没有”，从这句话，我们也不难看出威尔逊对于在二十世纪初颇为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共有的对西方人文传统追根溯源的方式的确令他们对文学的观察更加犀利更有穿透力。他们也都有一个倔强的作家梦，威尔逊有小说《我想起黛丝》行世，特里林则写过小说《旅途 midpoint》，两位批评家的小说都远远谈不上

图为特里林

成功，几乎完全被他们大名鼎鼎的文论所淹没，但是创作实践使他们更加了解创作过程那难以言传的秘密，这些对他们的批评生涯都起到了正面作用，赋予他们的文论充满魅力的柔软质地，反而提升了这些文论的批评力度。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新批评派正如日中天，威尔逊和特里林则是当时最重要的抗衡力量，威尔逊对新批评的批评态度是通过谨慎的回避传达的，对一众新批评中坚批评家他从未在文章中提及，事实上威尔逊对于“批评的批评”（评论

批评家）从来不感兴趣，对批评成为自身的目的这一事实，他肯定是既惊讶又不屑，他倒是罕见的评论过特里林的第一部专著《马修·阿诺德》，当然是加以称道，或许从中嗅到了同道的气味？而特里林在《海明威和他的批评者》一文中也引用过威尔逊关于海明威的论述，并称那是他知道的“评论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文章”。特里林对新批评有直接的批评，在《往昔意识》一文中，他指责新批评派“在摈弃历史方法的过程中忘记了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事实是一个存在于我们的审美经验中的事实”。实事求是地讲，新批评派初登文坛的时候确属一股清新的力量，一方面它是为了解释现代派诗人的新诗而发明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为了修剪向作者传记和社会状况伸得过长的枝蔓而出现的，可是一旦新批评成为正宗，它即走向自身的反面，显露出狭隘的视野和冥顽不化的学究气。对于新批评相近的批评态度，显露出特里林和威尔逊共有的深刻洞察力。

当然，作为独树一帜的批评家，两位批评家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文风上讲，威尔逊更加直率辛辣，不惮做出清晰的判断，而特里林毕竟是学院中人（博士毕业后一直到去世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其文风更具思辨性，讲求逻辑链条的缜密，比如同为对诗人弗罗斯特的批评，特里林1959年3月26日在弗罗斯特85岁生日晚宴上的致辞，保持了他一贯的对于“复杂性”的追求，他坦承“我



图为威尔逊

于弗罗斯特先生的经典作品保持了疏远的状态，因为我发现这些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成分，它可能本身就会诋毁批判性知性的事业，也可能会令其仰慕者做出这种诋毁的事情”，虽然讲稿的基调是确凿无疑的颂扬，但这次演讲仍然给特里林带来很大麻烦，许多读者，乃至学者和诗人都在报刊上撰文抨击特里林的无礼，特里林备感窝囊，其后他不得不很快在报刊刊载全文，作为对那些以偏概全的攻击的回应。相较而言，威尔逊对弗罗斯特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在《光明的支柱》一文中威尔逊直言弗罗斯特是“极度迟钝所以当然写出非常贫乏的诗文”。然而对于喜欢的作家，威尔逊也更加热情，充满情感，《阿克塞尔的城堡》中对兰波的激赏称得上是肺腑之言，体现出威尔逊真性情的一面；而特里林对他最喜欢的作家简·奥斯汀和亨利·詹姆斯的褒扬也是有节制的，始终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在涉猎的范围上，威尔逊兴趣更广泛，显得更为精力充沛，他的许多著作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诸如《美国人的恐慌》（1932）、《到芬兰车站》（1940）、《死海古籍》（1955）、《向易洛魁族印第安人致敬》（1959）等，这些书籍涉及经济、哲学、历史等领域。特里林的全部创作都在文学领域之类，他的专著主要有三本《马修·阿诺德》（1939）、《E·M·福斯特》（1943），以及晚年在担任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时的演讲集《诚与真》（1972）。其余都是由一些影响巨大的论文构成的论文集，自然议题主要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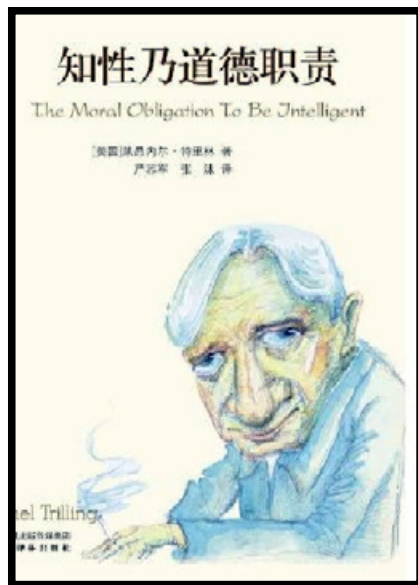
学，稍稍涉及到教育（比如《论教授现代文学》）、艺术（比如《艺术、意志与必然性》）等其他领域。较为集中的议题，确实给特里林的文论带来相应的他所期望的深度，美国学者沃尔顿·利茨在《美国当代文学》一书中尽管承认威尔逊是“始终不渝地反映他那个时代复杂生活的批评家”，但他也不忘指出“威尔逊的文章没有一篇达到过莱昂内尔·特里林最好的文章里那种经典的高度”。

当然，作为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威尔逊和特里林所处的年代里那些最流行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包括他们谨慎地与之保持距离的新批评——在他们的文章中都能找到印迹和回声，只是他们思想上的敏锐使他们不至于成为这些思潮的奴隶，而是把他们作为自己观察文学的工具——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弃置不顾。关于这一点，特里林在《文学体验导引》——一本为52部自古希腊戏剧以来的经典著作撰写的评鉴——一书序言中说得清楚：“我所写的并不传达什么特别的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有些评鉴中的重点落在形式及技巧——诸如意象、语气、视角、诗律、措辞等等，读者应该知道的方面。还有些评鉴涉及到文学惯例，或因老旧或因新颖，读者也许并不熟知。我可以畅所欲言谈论一部作品的明理和隐奥，并追寻（有时是质疑）它的道德、社会和宗教理念。……简言之，我会充分援用文学话语的任何要素，只要我认为它们与作品相关，并能使作品更易理

解,更加有趣。”这段话可以视为特里林和威尔逊共同的批评方法论,但就在这个层面上,二者也有显著区别和各自的侧重,简言之,威尔逊恢弘的批评视野将整个社会纳入其中,而特里林文论中最关键的词一定是“道德”,他善于从道德的视角观察文学,并最终将他自己的那棵批评之树用道德的养分浇灌为参天大树。

追求真理的复杂性

不过,对于将这种将社会和道德泾渭分明加以区分的两分法,特里林一定会马上提出异议,因为就像他自己在许多场合一再重申的那样,他信仰的真理就是“复杂性”。对所有言之凿凿、黑白分明的观念,他都持有一种天然的怀疑态度。特里林习惯于从事物的表象向下追索,其结果往往是在善举中寻觅到恶的踪迹,在恶行中寻觅到善的留痕。这正是他行文让人迷恋同时也让人晕眩之处。关于道德和社会的关系,没有人比特里林的观察更犀利的了,在《风俗、道德与小说》一文中,他以激赏的语气写道:“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只有亨利·詹姆斯一个人明白,如果想要衡量出小说中道德与美学高度,小说家就必须使用社会评论这架”梯子。”也就是说,道德作为一种抽象观念,势必要附着在社会这个物质载体之中,对于道德的评判和分析也就因此有了实在的对象,而对于小说水准的评判则获得了一把可以信赖的尺子。正是基于这种对道德和社会的复杂观察,我们说特里林是



莱昂内尔·特里林
《知性乃道德责任》

严志军、张沫译

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定价: 48元

一位善于从道德看文学的批评家就不再是一个草率的结论了。

回顾特里林的批评生涯,我们可以看到他像所有大批评家一样具有深刻的一贯性,同时能对政治和社会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从早期作品《马修·阿诺德》一直到晚年的《诚与真》,特里林一直在对文学作品的道德意图和社会目的做条分缕析地探讨,并且一再重申“文学有着一个讨厌的毫无美学趣味的传统,就是强调某种程度的直接实用性”。特里林所有的文章都堪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文章”,当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的兴趣会有所旁溢,而在他去世以后由利昂·维泽尔蒂尔编辑的文论集《知性乃道德责任》则是其道德视角最集中的体现。这本书译成中

文有52万字，包括29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有约两三万字，是对论题从容而细致的探讨，这些文章亦体现出特里林一贯的敏感文风——特里林敏捷的文笔似乎是在由观念构成的镜子的峡谷里穿行，他的典型的措辞就是在两个对立的观念间来回碰撞，在一种让人几乎晕厥的逻辑缠绕中，深刻的观察业已完成。

试举几例，这些句子是我在阅读时随意用笔勾画下来的：“向社会不公正作斗争是正确而高尚的，但选择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所有道德问题，相反，还会产生尤为艰难的新的道德问题。”“《曼斯菲尔德庄园》试图包容踌躇和困难的优雅。那种将道德当做实现的风格和安逸的优雅的观念是不可能被摈弃的，这不仅是因为有些作家总是不断地坚持这一点，而且因为道德本身也一直在坚持这一点。”“我们在观看悲剧的痛苦场面时会产生愉悦感，因此也会出现负罪感，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恰好能消解这种负罪感。”“当我们聚精会神关注那些伟大的具有鼓舞意义的书籍所讲述的道德生活时，我们实际上模糊了道德事实中大量的无聊实质。”“他（指弗罗斯特）使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生活中的可怕事物：他们或许感受到这样一种道理，即只有能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可怕事物的诗人，才有可能让他们获得宽慰的感觉。”诸如此类的论述还有很多，它们表明特里林的思维中有一股坚韧的逆向思维倾向，对于真相的追寻往往把特里林从一个概念带向另一个相反的概念，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

方式在特里林这里不是作为外在的矛盾修辞的习惯性产物，而是通过复杂细致的道德剖析得来的，因而更形珍贵，而由此推导出的初看让人意外的结论也就更具说服力了。

《知性乃道德责任》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已成为经典之作，集中数篇文章论及特里林最喜欢的两位小说家简·奥斯汀和亨利·詹姆斯，为这两位作家在二十世纪经典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艺术与神经症》一文则是特里林最著名的文章《弗洛伊德与文学》的延续，在围绕着特里林的诸多标签中，弗洛伊德主义分子大概是最接近特里林本质的一个界定了。特里林接受弗洛伊德的自我观以及俄狄浦斯情节的关键性作用，他还特别称颂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尤其是《文明及其不满足》和《超越快感原则》。不过特里林到底没有成为成色十足的弗洛伊德分子，他巧妙地通过极其复杂而又让人信服的分析，将弗洛伊德的理论转化为阿诺德著名观点“文学是对人生的批评”的一个有力的论据。在《弗洛伊德与文学》的末尾，特里林说得清楚：“没有一种艺术家所相应的人生观，能够保证他的作品的质量。但是，弗洛伊德的诸原则的诗品质却启示我们，这种人生观对于艺术家来说，并没有使人的世界狭隘化和简单化，反倒使它变得开阔和复杂起来。”《论教授现代文学》一文是特里林对西方现代文学教学问题的反思，在对美国高校创办现代文学课地缘起做了一番介绍之后，特里林亮出了自己的底线：“最终我

不得不决定，只有用一种方法才能教授现代文学，那就是不使用什么策略，也不采取有意识的谨慎态度。”这是一种开放的治学态度，从而将特里林带出形式分析的狭小天地，致力于从文化状况来研究文学状况，而“文化状况又被视为有关道德问题的宏大而复杂的斗争，道德问题则被视为与无理由选择的个人形象有关，最终的个人形象又被视为与文学风格有关”。在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逻辑推理过程中，特里林将文学和文化、道德、个性化以及风格等诸多相距遥远的概念联系起来，而他所有的批评工作都在细致剖析这些概念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极其细微和复杂的互动。

聚焦小说的道德流动性

当然道德概念仍然是特里林关注的核心，《知性乃道德责任》一书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涉及道德问题——无论他在谈论文学、艺术还是哲学。《风俗、道德与小说》像是整本书的序曲——亮出总的观点，点明特里林执著于道德批评的基本出发点：“体现道德内容的小说影响了众多的现实利益，让很多人意识到了潜在的情感，使他们不容易变得麻木或漠然，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氛围，使得不公正的现象难以生存下来。”其着眼点毫无疑问仍然在于如何促进社会的建设。《曼斯菲尔德庄园》、《伊萨克·巴别尔》、《惰性的道德》、《最后的恋人》诸篇则以单个作家或作品为研究对象展开评论。并不让人意

外的是，所有这些评论并没有塑造出一个刻板的道德家的形象，因为特里林的敏感使他一直将“道德”当做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像许多蹩脚的“正义”的批评家那样，讲道德简化为一把拙劣的美学标尺。对于那些流于说教的道德家特里林在《美国的现实》一文中表明了拒斥立场：“就我们而言，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嫌滞后，但正义而混乱的愤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而幼稚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道德说教一般意味着某种僵化的道德规条，而特里林早就在《惰性的道德》一文中抨击了未经激情和理智透视的道德，“人类的种种善举，其实也并非都出



莱昂内尔·特里林

《文学体验导引》

余婉卉、张箭飞译

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定价：28元

于高尚的为人，而更多地事因为我们碰巧深陷其中！这就是习惯性的道德，或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道德。”这种近乎麻木的善行，没有经过激情的痛苦抉择，没有经过理性的细致过滤，因而它是不值得信任的，特里林甚至略嫌尖刻地评论说：“那些善良的普通人，他们对自己的家庭责任非常忠诚，而他们对集中营的事实却不屑一顾，尽管他们就生活在集中营的阴影下。”随后他得出结论：不——我们不能赞美惰性道德。这种清晰短促的结论性的话语，在整部书里可谓凤毛麟角，可见特里林对这种僵化的道德是何等憎恶。特里林欣赏的是能充分体现出道德流动性的作品，所谓道德流动性是指小说家用复杂含混的措辞和语气，颠覆人们惯常的刻板印象，令读者对小说内容的道德含义很难捉摸。特里林认为这种道德流动性将读者正确地置于善恶的交汇点，而那里正是激发读者思考的最佳入口。正是在此意义上，特里林很欣赏纳博科夫的引起巨大争议的小说《洛丽塔》，“《洛丽塔》让我们没有机会确定态度，找到根源。或许这就是它敦促我们形成奇怪的道德流动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它为何能以杰出的实力去表现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而笼罩在巴别尔小说《骑兵军》中的善良和野蛮交织，同情和杀戮并存的混杂气息自然也就引起特里林格外的兴趣。

特里林在很少的几处地方为文学的形式方面做了辩护，在《利维斯—斯诺之争》一文中，特里林批评利维斯将道德意识视作文学所对应的主要人类才能，“他

（指利维斯）对这种观点非常执著，因而导致他在批评思想上的错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艺术的其他方面，即那些不具必要性的、源自欣快状态和游戏冲动的方面。”不过，这只是特里林逆向思维的一种惯性罢了，自然也符合他对所有确定性结论的质疑。总体而言，当特里林在著作中提到“形式分析”时，总有一种挑剔和审视的意味，他显然相信作品的社会和道德内容比形式技巧重要得多。可是善于从技巧出发探讨文学的那些作家和学者未必会完全认同特里林的观点，因为所有对文学的道德内容细致入微的分析，都最终指向文学的字面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作品的道德流动性越强，作品的文字表达相应也就越加精微和敏感。粗糙的文学形式根本无从表现处于流动状态中的道德。在此，道德和形式最终统一在杰出作家浑然一体的作品中。美国大诗人庞德的名言——“技巧考验真诚”——正是这一理念最有力的表述。从作品的道德和社会层面研究文学，以及从形式方面研究文学，客观地说只是两条不同的批评路径，都可以产生卓越或者愚蠢的批评家，关键在于不能墨守陈规，将自己的批评工具变成教条，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处在自身批评工具对立面的那些文学要素，换言之，好的批评家关键在于要具备敏锐的感受力和开阔的视野，如此他才有可能善用自己手中的批评工具，不至于反被这些批评工具所囚禁。

在此意义上，特里林早年所受的新批评训练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特里

林年轻时曾是新批评重镇肯庸文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肯庸评论》的编辑并为其撰稿。在《文学体验导引》的诗歌部分，特里林展示了他新批评的理论素养：他津津乐道于蒲伯的英雄双行体在融合感觉和声音时的妙用；在论述华兹华斯的诗作《决心与自立》时，则将这首非同凡响的诗作的成功首先归于华兹华斯运用标点符号造就的复杂节奏感；特里林赞许霍普金斯敢于“冒险凭依头韵、内韵、谐音以及微妙、精心地递进与变化元音营造节奏”。在其他的著作中，特里林也屡有新批评气息的论述：“批评，大家知道，应该始终关注诗作本身。”“文学研究倘若要实现它的不言而喻的诺言，必须迟早成为一种语言研究。”所幸，这些看起来和特里林通常强调道德、社会研究的批评路数相左的说法，没有造成特里林思路的混乱，而是给他从道德观察文学的视角增加了一面更开阔的广角镜，而特里林在著作中念兹在兹的“道德”因此不再是通常的刻板严肃的形象，反而多了一层柔和亲切的气质，用特里林自己的话说就是增进了道德的流动性，并最终将读者捕进审美的陷阱。

辨析“诚与真”

特里林最后的著作《诚与真》堪称他的批评生涯的完美句号，这是特里林1970年春在哈佛大学担任诺顿诗歌教授时的演讲集，主要围绕历史中的自我之真诚与真实的问题展开，探究这两个



莱昂内尔·特里林

《诚与真》

刘佳林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定价：21元

经常被使用同时又总是被误读的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如果说之前特里林的批评还是通过道德的视角观察文学，那么《诚与真》则是这一视角的深化和延续，最终真诚与真实这两个概念成为聚焦的中心。的确，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真诚”经常成为针对一切批评的挡箭牌，其招牌式的说法是——“我追求真诚地表达”或者“我是在诚实地表现现实”，言下之意，其作品所存在的缺陷都是小儿科，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这种说法恰恰忽视了“真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多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下它甚至可以指向意义的任何方向，它不是道德这一更大的概念的定海神针，而是漂浮在流动的道德之河上的一页风帆，指望“真诚”

去确定方位提供标尺，只会得出滑稽的似是而非的结论。

书中涉及大量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特里林在以前的批评生涯中评论过的——简·奥斯汀的小说、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莎士比亚戏剧等等，但对这些小说的分析旨在透视真诚与真实的概念内在的复杂性，简言之是作为一种论据被提出。由于特里林对这些文学作品早就做过精深研究，撰写过详尽的论文，他的引用分析显得挥洒自如、举重若轻，而“诚与真”则在特里林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下显现出本质上极其多变的面貌，当然特里林最愿意凸显的是它们内部所携带的反讽意味。

“就像爱一样，有些词要想让它们保持确切的意义，最好就是不去谈它们，反讽就是这样的词，其他类似的词还有真诚、真实等。”这是特里林在引用了王尔德的名言——“形而上学的真理就是面具的真理”——之后说出上述这番话的。特里林寻章摘句、旁征博引，除了文学，他还大量援引卢梭、马克思、马尔库塞、福柯等哲学家的言论，这并不奇怪，诚与真原本也是哲学概念。特里林几乎动用了一生的知识储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来探讨“诚与真”，它们既可作为艺术的一个标准（当然是极具灵活性的标准），也是个人生活的一个品质，同时它们也是理解道德和社会、文学的关系的中枢，对于“诚与真”理解的深度其实也就印证着对于社会和文学的理解深度。

特里林辞世四十多年了，在当代各种

文学理论闪耀登场随即湮灭的文学批评界，他仍然是一个异数，他在数种理论之间游刃有余的批评能力，他的雅致文风，都使他很难找到继承者，哪怕他有许许多多的欣赏者、崇拜者。就像特里林的先驱也只有门肯和埃德蒙·威尔逊等寥寥数人一样。这些美国文人以其相似的道德热忱和卓越的艺术感受力，成为这个日益技术化的世界的一种批判力量，他们整个批评生涯都在试图厘清文学作品是通过何种渠道达致对于人性的建设性作用。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尤其在当今被纷繁炫目的表象所遮盖的贫乏的世界上。❶

欧洲的陌生人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 sunxiaoji@gmail.com)

史蒂芬·沃尔在回忆录里评价布莱尔当年的对欧洲政策时,半开玩笑地说,首相先生始终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而每临抉择的关头,往往舍欧洲而就美国。沃尔曾担任多任首相幕僚,主管英国的欧洲政策,即使开玩笑也不能信口雌黄。他又说:“当我们得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的其他国家成员抛开英国单独签订条约时,真是一种解脱。”

沃尔的言辞,可谓英国对欧洲态度的讖语。即使在他离任英国驻欧盟代表的位置多年后,英国的首脑对欧洲大陆的态度依然是若即若离,游走于中心与边缘之间;而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来讲,英国的存在即使没有被贴上“欧洲的恶人”的标签,至少它也是一位“欧洲的陌生人”。在2011与2012年更替之际,英国的首相卡梅伦再一次对欧洲说“不”,拒绝加入新的欧盟条约,他不看好欧元,甚至不看好欧洲联盟的前景。“我们祝他们好运。”卡

梅伦对媒体抛下这句酸溜溜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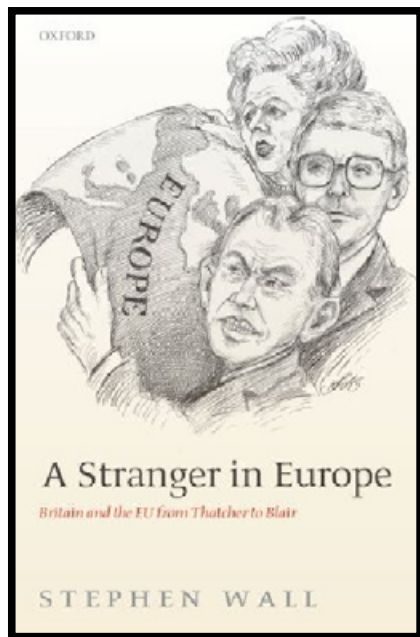
《福布斯》杂志的一位美女记者就此写评论说“别怪卡梅伦主动选择退出”,因为“这光景,谁又会愿意与德法同坐一条船呢?”当气急败坏的欧洲媒体普遍朝卡梅伦泼脏水的时候,有这样一位美女媒体人相挺,本身就能说明“高富帅”的卡梅伦对异性的吸引力。不过,设若当前的欧洲没有陷入严重如此的经济困境,英国首相难道就会敞开双臂奔向欧洲怀抱?也不尽然,英国所扮演的欧洲“边缘人”身份,经年累月,已然形成一种“传统”,哪会这么轻易改变。

我所认识的英国人无一不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们统称为“欧洲人”,而以“不列颠人”自居,仿佛英国和欧洲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所在。刚开始,外人难免对此不大理解。至少,我就无法想象自己称自己为“中国人”,而将中国的近邻们统称为“亚洲人”。不过,我也想到自16世纪

的亨利八世时代，英国就为了一桩“皇室离婚案”而彻底脱离欧洲天主教教廷，自立门户，几个世纪之间又三不五时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树敌开战，长此以往，产生英国与欧洲“两岸人们之间的隔阂”，也就不难理解了。

闲篇扯得有点远，还是说回现代。一提及现代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就不得不说到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欧共体成立之初，正是二战后英国的帝国余晖褪去，但英国人的“日不落”心态尚未调试得当的历史时期。加上英国曾经的盟友——法国人戴高乐极力阻挠英国参与欧洲事务，高傲的英国人正好在被欧洲拒绝的同时也拒绝欧洲。直到1973年，麦克米兰政府才成功让英国入盟成为欧共体的一员。首相麦克米兰首次将英国称为了“欧洲的一员”，但他也不忘在一本政治宣传册里说：对于欧洲联盟，“英国更青睐一种基于经验上的渐进式合作，而不是纵身跃入黑暗中。”这算是老首相为英国接下来几十年欧洲政策定的调。

时至今日，英国对于欧洲的态度，依然可以用“基于经验上的渐进式合作”来形容。加入欧共体之时，英国国立已经衰微，经济已上落后于西德、法国，然而“入盟”所需要承担的义务，英国却并不比德法两国少。以从税收中缴纳的“会费”为例，英国在70年代末的支出是法国的两倍，与西德持平。但英国的经济总量却长期排在这两国之后，经济实力与承担的义务不对等让英国政府首脑们颇为光



火。80年代出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为此没少和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当年法国的“上流”报纸《世界报》甚至不惜用了这么一个旁门左道的标题：密特朗对阵撒切尔——当铁娘子杠上岩石男。

“杠上”的最终结果是谁也赢不了谁，欧共体没法让英国屈服，英国的行为却越来越像是欧洲的一个“坏孩子”。当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爆发时，英国迫使欧共体成员国对阿根廷实行贸易禁运，但实际上，此举没有得到普通欧洲人的支持，许多人感到，这时英国无非在利用欧洲为自己牟利，而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问题上，却始终和欧洲“过不去”。当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被击沉时，不少欧洲的农场主走上街头，大声斥责英国：“欧洲八百万农场主的利益远远比福克兰群岛上的1600人重要……如果

英国佬这么讨厌欧洲共同农业政策，那就请他们滚出去！”

“欧洲的恶人”这个恶名，大概就是这时被套在了英国的头上的。在强硬的撒切尔夫人退出政坛后，英国的首相换成了态度较为软化的约翰·梅杰。梅杰对欧洲事务素有积极参与的意思，但他毕竟与撒切尔一样，乃是保守党政治家，不可能摆脱保守党“谨慎对待欧洲”的政治传统。包括今天同属保守党的卡梅伦，时常发布一些不友善的言论来“刺激”一下欧洲，也可以说是保守党政治思维的一个体现。倒是1997年抱持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工党重新执政后，首相布莱尔对欧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示好。“我希望英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家。”这句话几乎贯彻了布莱尔从竞选到卸任首相的政治生涯。

不过，正如开篇所提到的，即使希望从欧洲谋求利益如布莱尔者，实际的政策也是欧美“两手抓”，而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沃尔在书里一语道破天机：“英国加入得太晚。”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欧共体最初六国“梁山聚义”时，英国被挡在门外。而当英国终于“入伙”时已经廿年过去，欧洲座次已然排定，这个“入伙”自然变得索然无味。英国欧洲之间数十年来的关系也因此若即若离，不管执政者是撒切尔、梅杰、布莱尔还是卡梅伦，这样的关系都很难发生改变。

对英国人而言，被目为“恶邻”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陪伴了他们世世代代的英镑还继续揣在人们兜里。英国没有因为布莱尔当年的一时兴起而真的加入欧元区。手中英镑虽在缩水，但与欧洲的这层“历史隔膜”，却确保了原本经济元气就已大伤的英国没有第一时间被拖入欧债泥潭。今之视昔，布莱尔所失，未尝不是英国之所得。Q

以书论书



特约撰稿人 严飞 (fei.yan@green.oxon.org)

书摆放的时间久了，就会生蛀虫，特别是在江浙一带的梅雨气候下，书尚未读，就已被小虫蛀蚀得体无完肤。读书人都是爱书之人，哪里又舍得自己的书被啃得稀巴烂，于是在太阳晴好的午后，就要晒一晒书。

晒书是个雅趣。台湾诗人痖弦就写过一首只有两行的短诗，诗云：一条美丽的银蠹鱼/从《水经注》里游出来，标题即为《晒书》。书虫被美喻为蠹鱼而非蠹虫，这只有爱读书的文人才想得出来。虫子形象不佳，又会蜇人，哪里有鱼的姿态美妙，浮沉书籍之内，摇鳍摆尾，意向迷人。

另一种晒书则非真的晒书，而是摆出姿态，晒的是学问。梁实秋就写过一则有趣的小故事，名曰《晒书记》。开头就开宗明义：《世说新语》：“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书。’”我尝想，这位郝先生直挺挺地躺

在七月的骄阳之下，晒得浑身滚烫，所为何来？他当然不是在作日光浴，书上没说 he 脱光了身子。我想他是故作惊人之状，好引起‘人问其故’，好说出他的那一句惊人之语‘我晒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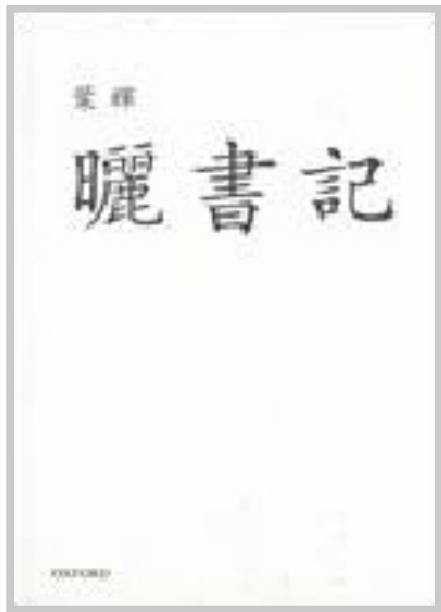
七夕秋阳暖，人家晒衣服，郝先生袒腹空庭自晒书，不知是一种自嘲，还真的是满肚子的学问需要向侪辈夸示，以显出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的高尚品味？

梁实秋先生就说，书既装在肚里，消化了，吸收了，其实就不必再晒，经纶满腹，是要拿出来救世济民，而非如同晒牢骚一般，英雄无用武之地。所谓“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常常被晚辈唤作“叶辉叔叔”的香港作家叶辉，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他在这本书里所晒的，也自然不会仅仅只是自己腹中的学问，虽然叶辉叔叔知识版图之宏大，早已是香港文化人的共识。

他可以直切入繁杂问题的要害，然后信手拈来大量书籍以进行深入的对比和批评，可谓以书论书；也可以很悠然地用诗意的语言写出清爽的文字（叶辉是诗人出身），让读者于不经意间捧读之时，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然后一气呵成的人到文字的戏里去，可谓入木三分。

叶辉叔叔之所以晒书，首要的原因，就是香港这座城市，读书会被视为另类的行动，而读书人也不是一个遭人讨喜的称谓。香港人被视为“经济动物”由来已久，搵快钱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共识；政治上，香港目前又面临着如何准确界定与内地关系的定位问题，其焦灼感日益强烈；文化上，香港每年的文化演出活动确实不少，但普通市民阶层的文化精神又十分欠缺，文化节目并没有贯穿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文素养的发酵场。至于读书，整个香港社会赚钱的节奏如此之快，又哪里抽得出时间读书？就算有时间，逼仄的小屋里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储存这些书，到头来还是要当废纸一样卖掉，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太低，十分不划算，自然只能作罢。叶辉叔叔就说，“一个不读书的城市，总是面目可憎的”。但是面目再可憎，也是养育自己的一方土地，本土情怀的热爱之下，一个读书人总归要做些什么，为这座不读书的城市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叶辉叔叔所晒的，正是香港读书人被淹没在经济指标大潮下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却有着很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



叶辉

《晒书记》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叶辉叔叔晒书的第二层原因，是想通过晒书，身体力行地告诉读者，什么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读书是乐事，也是苦差，这倒要视乎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不仅仅是读者，如何透过读书明辨是非，解放自我，介入社会，认识世界，这是一个合格读书人终身学习的课题。”在叶辉看来，坚持真相，坚持良心，用知识批判介入公共事物领域，为弱势群体发声，为社会不公呐喊，进而点滴地改善现状，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才是一位读书人的职责所在，而非沉迷于穿越或者情绵的文字意淫中，将文化生活平庸化。在另一篇《边缘族群的妄想与“一天”》一文中，叶辉更加明确地指出：“谁都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人生，但

并未永远哑忍，偶有片刻光明而总是转瞬熄灭，活在逆境却不忘辨认真理，即使到头来还是活得艰辛。”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既不应该怀念过去，也不应过分寄予未来，而是要对“现在”这个题目，坦荡荡地晒出自己不受阉割的思想，以及愤怒，这才是一种行动的力量。

香港有一个叶辉叔叔，我们内地又该做何反思呢？

严打之下的“道不拾遗”

特约撰稿人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道不拾遗”常和“夜不闭户”并列，成为中国式理想国的重要指标。追溯两者的词源，“道不拾遗”典出法家文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夜不闭户”典出儒家文献《礼记·礼运》。“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并列，说明儒法不仅有互相冲突的一面，更有暗通款曲之处，否则，儒表法里的模式不可能历两千年而不衰。

儒法相济，但侧重于儒家，还是侧重于法家，会产生路线差异。具体到行政

官员，有循吏和酷吏之分，前者侧重于教化，后者侧重于严打。有人把严打称为法治，我不敢苟同，这里不予采用。近的事例暂且不说，以《汉书·酷吏传》中的严延年为例，可以领教严打之下的“路不拾遗”，是何种风采。

酷吏在史书里常有“刻薄寡恩”的劣名。可是，酷吏一旦降临人间，又会获得群众拥戴。“刻薄寡恩”，换成另一种说法是“铁面无私”。酷吏绝非一无是处，他们常有一些非常之举，使得他们具有“酷”（cool）的超凡魅力。正是因为如此，酷吏在现实中，并不像在史书中那样容易辨认。

严延年冒着生命危险挣到第一桶金。大将军霍光废除了刚刚继位27天的昌邑王，尊立汉宣帝，严延年弹劾霍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虽然弹劾无疾而终，此举获得朝廷上下的敬畏。接着，严延年弹劾霍光密友、时任财政部长（大司农）的田延年携带武器侵犯皇帝的车队。但是这次弹劾马失前蹄，一方面田延年否认此举，另一方面御史中丞谴责他为何没有立即通知有关部门阻止此举。严延年反而被弹劾，论法当死，他只能逃窜，直至大赦，才得以复



出。严延年的第一桶金，可以理解为“舍生取义”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亡命之徒”的收获。

此后，严延年担任地方官员，但是因为“坐杀不辜”被免职。但他并未因此退出政坛，而是很快复出，一度在中央政府任职，后来担任涿郡太守。在涿郡，两个大姓权倾一时，严延年开展打黑行动，主持打黑的主管官员准备了轻重两套方案，准备见机行事，被识破，下狱处死。于是，其他官员争先恐后，纷纷重拳出击，两个大姓被视为地方黑恶势力，分别有数十人被判处死刑，郡中实现了“道不拾遗”的理想。

过了三年，严延年改任河南太守。他的主要工作是“摧折豪强，扶助贫弱”，具体方式是：“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也就是说，弱势群体违反了法律，千方百计把他们无罪释放；新贵阶层对民众有所侵犯，一定从重从快严惩。大家都认为罪该致死者，无罪释放，大家认为罪不至死者，执行死刑。这样的效果是，属下和百姓都觉得领导高深莫测，因此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严延年对待属下关怀备至，不论出身，只要忠诚，就情同骨肉。于是，冷冰冰的工作关系成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在这种关系面前，隐私也不复存在。不过，严延年也有很傻很天真的一面，他认为一个狱史很清廉，但那个狱史只不过是随身携带受贿的银子。可以看出，酷吏虽

然力主反贪，反贪一片形势大好，但是这种大好形势却无法经受仔细推敲，反贪只是领导控制属下的一种方式。

等到冬天，严延年将各县囚犯集中在一起处斩，血流数里。严打的效果极为显著，令行禁止，郡中稳定压倒一切。有同僚劝他慈悲为怀，严延年表示河南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定要严打才行。颍川太守黄霸反其道而行之，重在宽恕之道，郡中一片清明景象，严延年对其非常不以为然。他的母亲赶来一起过年，恰逢各县囚犯被押解到郡中集中斩首，对他表示强烈不满。虽然严延年态度不错，但是仅仅是客气地表示了孝道，并未听从母亲的建议。

法家的规律是，严打者最终被严打，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无一例外。虽然这已成为规律，但是酷吏们依然前赴后继。严打者严延年也无法逃脱被严打的命运，他后来被举报十项罪名，在闹市被公开执行死刑。与后世酷吏倍受群众爱戴不同，在严延年的时代，公众舆论尚未被全面控制，严延年在河南郡守的任上依然被称作“屠伯”。

创下“道不拾遗”政绩的酷吏，比比皆是。严延年之前有鄧都，《史记·酷吏列传》对他的事迹有记载。鄧都的第一桶金如同天降，他陪同皇帝出游，贾姬上洗手间，一头野猪色胆包天，跑了进去。皇帝示意鄧都把野猪赶出来，鄧都没有反应，于是皇帝准备亲自英雄救美，鄧都赶忙劝阻，美女到处都是，没了贾姬还有其他姬，但皇帝只有一个，一定要保重。皇

帝被说服，那头野猪一览春光之后，也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鄧都的临危不乱、顾全大局，受到太后的重赏。

济南有大姓不太听话，鄧都被任命为济南太守。他上任之后开展打黑行动，将为首者满门抄斩，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郡中不拾遗”的安定团结的局面。鄧都后来得到晋升，依然坚持严打的风格，以至被称作“苍鹰”。与严延年一样，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严打的命运，因为严打废太子而获罪于太后，被斩。

当“道不拾遗”的美丽蓝图和“屠伯”、“苍鹰”的名声联系在一起，严打也就现出了原形。严打与法治无关，或者

说，严打只是在违反法治的层面上和法治有关。严打更接近德治，比如以“惩强扶弱”作为动员口号，以“道不拾遗”作为治理目标。严打最终表现为人治，酷吏通过严打积攒个人的政治资本，以便更上一层楼。皇帝曾经准备调任严延年担任要职，文书都已经发出，但因为严延年的酷吏名声又宣告作废。

如果严延年可以控制并且制造公众舆论，他会怎么样，真是不堪设想。可以预料到的有两点：第一，他的严打力度会更大，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第二，他的历史地位会高出许多，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Q

大隐隐于市之旧书店传奇

特约撰稿人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fangyizhu@gmail.com）

四点半会议结束，五点半Brattle书店就要关门。我拖着被高跟鞋折磨得半死的脚，跟四四一起匆匆穿过弯弯曲曲的地铁隧道，向West Street狂走，终于在四点五十左右赶到。

Brattle所在处是波士顿的中心地段，紧邻着热闹的商业区，可是自从拐进West Street，便有一种脱离现代文明之感，待到走进书店，更是恍若穿越到几十年前。这是我在美国所到过的第一个旧

书店。我住过的都是中小城市，有Barns & Noble 和 Borders就已经要偷笑了，哪里能奢望旧书店——后来连Borders都撑不下去了。B&N一度是我周末读书的去处，虽然那里没有太多好书（基本跟新华书店一个级别吧），但我带着自己的书跑去读，只借用他们的桌椅和咖啡的香味。而波士顿号称“美洲的雅典”，有着无以伦比的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有众多爱书人作为忠实顾客，使得这个市中



心的旧书店成为可能。

四四说室外部分将会在五点收摊，所以必须先看。一排排书架，上面的书很杂很拥挤，按照标价的一元、三元、五元分成几个区。无人看守，书架上写着交款请到隔壁，给足信任。里面居然有中文书，程千帆编的一本非学术作品。特价区的书随机排放，给选书造成了困难，不过你可以用一句双关语来形容这个沙里淘金的过程：I dig books! 仓促之间没有发现什么好书，倒是看到几张中国面孔，我对他们行了一下注目礼。

一进室内，浓浓的旧书的味道扑面而来，如果深呼吸一下，仔细品尝这种味道，就会感到一些嗅觉以外的东西，比如历史的厚重、知识的价值、以及书籍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之忠实记录而特有的庄严。

店内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对空间的最大吝啬，书架的顶端距离天花板很近，书架之间距离也很近，如果书架间有人，而你想穿过去，不说excuse me是绝对不成的。店面不大，却分为三层，外加一个地下室，堪称站着的书店，非常之“波士顿风格”。我曾经去过波士顿一个历史悠久的著名餐馆，店面迷你到仅仅能容转身，却分为五层，分别是：一楼、一点五楼、二楼、二点五楼和三楼。

他们号称店里的书每一本都独此一册，所以一旦看到合意的，就必须果断拿下，否则可能被别人抢走。而且书的流动颇快，可谓铁打的书架流水的书。每天都有很多书从地下的储藏室被提拔上来，

而上架后一段时间内如果不能成功“牵手”，就会被赶到室外书场去承受风吹日晒，我猜想是先到五元区，再到三元区，最后沦落到一元区，这个过程对书而言颇为残酷（如果书有自尊的话），可对于顾客而言却无疑是大大的福音。那些在一元区的茫茫书海中遇见心仪已久的梦中情“书”的顾客，是不是都心满意足得直想就地打滚呢……

楼梯间墙上的招贴画是一些初版书的封面或名人签名照，但不是印的，而是手绘的，价格从几百到几万美元不等。更汗的是，那些天价招贴画当中很多都已贴上了Sold的红标签，比如售价七万五千美元的林肯签名照。可以想象，这些招贴画的流动也相当迅速，过一段时间再来，这些已售的位置就会被新画取代。有一些很眼熟的东东，比如《麦田守望者》，《洛丽塔》，《飘》，梭罗手稿。我心里不免转了个小念头：开旧书店实在不是什么多利的行业，而卖这些天价招贴画的所得，大概可以略微填补他们其它地方的亏空。

由于已经过了四点半，我与三楼上的骨灰级珍本们就这样缘悭一面了。虽然我不是收藏爱好者，却还是有些遗憾，就像生生错过了一个传奇。四四让我注意看二楼，楼板的材料是大理石，因为Brattle曾经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所以要吸取教训。火灾之后，侠义心肠的波士顿市民给书店捐助了大量图书，店主稍微清理了一下废墟，就在原址摆起了露天书摊（就是刚才我看到的），赚到足够

的钱以后便把旁边的一栋楼买了下来，即现在的店址。而原露天书摊照旧保留，原汁原味的红砖，加上张牙舞爪的烟熏妆，后来成为Brattle的一个招牌场景。面对这一独特而朴素的故事，各种面子工程情何以堪。

店主Ken回来了，四四替我们作介绍。Ken Gloss看上去是一个平凡的美国人，面善，个子不高，走在人流里面并不起眼，但他和他的书店在美国图书行业却是绝对的德高望重。他让我想起茨威格笔下的旧书商门德尔，那个活着的图书目录、在咖啡馆有着固定桌子的奇人、除书以外世事不通的书痴，在一战期间潦倒而死。而Ken却生逢其时其地，在一个地价贵比金的城市的中心地段维持着旧书店的神话。四四写的关于Brattle的文章已经发表在《新世纪》（本期《独立阅读》也有刊载），她说等杂志寄到，就给Ken拿过来。Ken很高兴地让店员送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装书的大兜兜，很朴素的蓝，印着Brattle的名字，我还没有舍得拆开。

如果你打算来逛Brattle书店，也许不一定需要准备很多钱（除非你打算买那些手绘招贴画或者珍本古籍），但一定要多准备几个小时，因为在书架之间看书是一件非常令人上瘾的事。这次我们到达的时候离打烊只有40分钟，所以一种忙乱感就像小老鼠一样挠着我的心底，令我不能从容翻看，只扫完小说和诗歌类就得开路了。走出室外，暮色中高悬着他们的招牌。○

波士顿情书之七

走，到西街去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silingluo@gmail.com）

X，如果有人告诉你，在波士顿有个小小的地方比整个世界都大，请相信这是真的。这个地方便是西街9号（9 West Street）布拉托书店（Brattle Book Shop）。

关于书店的故事有很多，比如说西尔薇娅·比琪（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 Co.）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故事，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与金斯伯格的《嚎叫》（Howl）的故事，不过，最要我的命的莫过于纽约女作家海莲·汉芙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

克思与科恩书店”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位白羊座的女人不仅是世界上最懂书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顾客，她与书店经理弗兰克·德尔二十年的书缘情缘，让我这个金牛座的女人几乎嫉妒到咬碎牙的地步，乃至常生发出生既不逢时也不逢地更无知己可逢的忿恨。幸亏，我发现了波士顿西街9号。我想我的这个伟大发现决不会亚于六十多年前纽约的汉芙发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可惜的是我没有汉芙那么懂书。不过，我依然想用金牛女的执拗与好强向你讲述西街9号布拉托书店及其书的故事。因为我知道，X，你一定懂的。



1

其实，要在波士顿发现布拉托书店并不难，因为它就在波士顿市中心Downtown Crossing，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周边的方位了。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书店有一个露天的大卖场。走在波士顿最古老、也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十字街口上，一不小心转弯便能在短得如袖筒似的西街上发现这个凹陷在古老街道与历史时空中的露天书摊：沿着两边赤裸斑驳的红砖墙，搭了两排书架，空旷处则摆了二十多个活动书架，大致分为一刀三刀五刀三大类，简单粗犷，这让第一次看到如此场面的我花容失色，胸中怒吼：这可是书呀，书呀，不是大白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错怪布拉托书店最美的一个故事。

1980年，一场大火将位于西街五号的布拉托书店五层木楼建筑烧得淋漓尽致，所有的古董书所有的老杂志所有有字的纸头随之都化为灰烬。此时的布拉托书店在老店主George Gloss三十年的经营下，已经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店铺成为美国老旧书行业里的龙头老大，George也以他对书的热爱和丰富知识，以及独到的经营方式赢得了波士顿人民的尊重与爱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George最为独到的经营方式就是清仓大甩卖。从1949年他和新婚妻子Dorrit用五百美金买下这间书店到1980年的那场毁灭性的大火，三十年间，一共搬了七次家，每次

搬家，George的清仓大甩卖都会成为波士顿的一个传奇：在搬家前几个星期，他的书便大幅度降价，直到最后真正的全部免费，掀起购书热潮。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流行城市更新，波士顿也未能幸免，有着凹凸不平石板路街道和古老店铺的老城区被拆除，建立起所谓的现代城市。这就是今天市政中心所在。那栋有些像世博会中国馆的市政大楼如一口灰色的巨大棺材，埋葬了这个城市最初的历史，只遗留下干草市场（Hay Market）附近几条小得像袖口的石板路街道供游人缅怀，而布拉托书店当年所在地布拉托（Brattle）街早已无迹可寻。1969年，George因此被迫进行了第七次搬家。他和他的牛仔打扮的伙计驾驶着装满书的马车，穿街走巷，一路高喊：“走，书虫们，到西街去！”吸引无数热爱书的人尾随来到西街五号，这就是今天布拉托书店露天大卖场所在地。正是George的七次搬家大甩卖，以及富有激情的政治演说与慈善事业，让布拉托书店成为当地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真正爱书人是会永远记住与自己心爱的书邂逅的美好的，当然，更不会忘记挖井人。因此，1980年这场大灾难发生后，当George和他的儿子Ken决心重建书店之时，善良的波士顿人给了他们极大的回报。就在被烧毁的书店附近，George和Ken重新找了一家店面，将他们能找到的一些书放在桌子上，两个月后他们重新打开店门迎接顾客。此时，闻讯而来的波士顿人纷纷将他们的旧书拉进

西街，无偿捐献给布拉托书店，当时的波士顿市长Kevin White也跻身其中，并给布拉托书店带来了一车的书。

于是，就在那烟熏火燎的滚烫的瓦砾下，一个新的布拉托如浴火凤凰，在旧的布拉托书店的瓦砾中重新再生了。当被烧毁的大楼清理干净后，留下了一大片空地。那些被拉进西街的书便放在这片空地上，顾客们就在露天手推车和架子上浏览着数千本旧书。仅仅三年后，布拉托书店就买下了这个露天大卖场隔壁的一栋楼，这便是今天布拉托书店所在地——西街9号。不过，露天大卖场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布拉托书店的一项主要业务。只要不下雨下雪，书店伙计每天都会将图书一车一车推到这片空地上，供爱书人自由浏览挑选。如今的书店老板ken刻意保持着这个大卖场老旧的风貌，甚至连熏黑的红砖头都懒得搭理，直接在烟熏火燎过的斑驳的墙上画了十八位世界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的大头像，表情夸张，面目狰狞，我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才认出其中有叶慈、海明威和卡夫卡，但我怎么猜也猜不出书的中文名字。后来和我一同去的Tom一眼认出Isaac Asimov，并告诉我这是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非典型的美国佬Tom很喜欢这位俄裔美国佬作家。据我后来网上查阅的信息，此君一生竟然写了500多本科幻小说。在他去世后，有盖棺之论曰：“他的作品愉悦了数百万人，同时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正是这堵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看法的

高墙和高墙下的那两排固定书架以及二十几个活动书架，让布拉托书店驰名美外，享誉世界。在网上，有人评选出世界上最美的十家书店，布拉托书店名列前三甲，网上所用的照片正是这个户外大卖场经营的模样。嗯，X，你注意到了吗？这个露天大卖场可是没有看场子的，每次路过，我都看到有十几个人在那里静静地乱翻书，却始终没有看到过伙计，只看到一张纸头贴在书架上：结账请到隔壁书店内。这弄得我有些阴暗的心理冒出一个有些阴暗的疑问：这里难道没有窃书贼嘛？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第一次走进布拉托书店的，自此，我认定这个地方比整个世界还大，认定我可以以此来击败海莲·汉芙的查令十字街84号。

2

马克思教导说，凡事物都有两面性。虽然我对这句常被用来做挡箭牌、模糊基本是非判断的话深恶痛绝，但这次我却愿意将其作为为布拉托书店叫屈的理由。虽然户外大卖场让布拉托书店成为波士顿的地标之一，可同时也让人引起误解，以为布拉托书店只不过是一般的二手书店。即便在波士顿工作四年多、喜欢书店和书的Tom，多次经过这个书店，也从没注意到还有一个户内的大书店，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书店三楼的古董书才是布拉托书店的精魂所在。

与波士顿林立的旧书店相比，布拉

托书店的一楼二楼，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需要留心才会发现地面是大理石的，而不再是容易引起火宅的木头质地的。此外再有的特别之处就是盘着楼梯而上的一幅幅已售出的珍稀书或照片的巨型招贴，比如1860年美国第一版的《物种起源》售价8750美金，而几乎同一时间的梭罗的一页手稿售价4500美金；1936年第一版的《乱世佳人》售价5000美金而1955年第一版的《洛丽塔》则售价1250美金；有着甘地亲笔签名的一张照片价值3000美金而那张有着林肯亲笔签名的照片则价值75,000美金；1860年“Baseball Players’ Pocket Companion”的照片价值12,500美金，有着音乐家George Gershwin签名的四小节音乐售价20,000美金，而有着画家、作家Edward Gorey签名的一张画价值6,500美金……而这些五花八门的珍稀图书和照片统统都是从三楼古董图书室中发现的。我就这样被这些巨型招贴们牵着鼻子，跳过一楼又跳过二楼直接跳到了三楼古董图书室。

有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法国人波盖取笑美国人历史太短，说：“美国人没事的时候，往往喜欢怀念祖宗，可是一想到祖父一代，就不能不打住了。”美国人马克·吐温回敬说：“法国人没事的时候，总是想弄清他们的父亲是谁，可很难弄清。”徜徉在布拉托书店三楼，我突然想起这个笑话，觉得非常适合送给那些胆敢无畏地嘲笑美国古董书太年轻的中国人。虽说中国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可真

要是在书店找到一本和父辈年龄一般大的、还可以称之为书的书还真难呢，当然，更别指望在书店中看到历史的流动与文化的沉积。布拉托书店虽然经历了1980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灾，但显然，美国文明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因此在这个书店出现断裂和真空。实际上，成立于1825年的布拉托书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书店之一，而今它所呈现出的活力令所有的大大小的连锁书店或是独立书店、新书书店或是二手书书店都望尘莫及，尤其是三楼独一无二的古董图书室。从最早期欧洲出版的有着中世纪风格的羊皮装订书，到起初从伦敦引进版权在本土出版发行的精装书，再到近代限量发行的绝版图书，从宗教、科学、历史、文学到建筑、旅游、地图、生活等，美国几百年来图书历史进程在这里得到了完整而具体的呈现。其中，当然最多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书，几乎有整整一面墙的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圣经》，如据伦敦第二个版本改进和放大了第一次在美国费城出版的1804年的《Scott’s family Bible》，而同样是这个版本、1818年在波士顿出版的这套《圣经》则稍微便宜些。又如1864年伦敦发行的第17版的Thomas Hood的《诗集》售价75美金，而1945年有着Moore Merrill亲笔签名的诗集《New Zealand》则价值50美金；又如1816年波士顿出版的一本皮革精装的品相好的美国建筑指南售价375美金，而1928年牛津大学出版的品相颇好的精装书《西藏人(The People of Tibet)》

售价65美金……

每次走进这个房间，我总能看见一位或是几位年轻人在这里静静地忙碌着，以及一位或是几位神情淡漠两眼死盯着书架、仿佛来自外星球的读者。一位朋友告诉我，她在哈佛的古希腊语老师就曾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哈佛医学院一位退休教授Nelson Kiang，1955年在这家书店买了他生平第一本书后，便成为这家书店的常客。这位教授已经向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寄去两万本图书，并将持续下去。这让我对这个房间充满了敬意，那些有些散架了古老的巨型书和杂志，更是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像哈利·波特那样找到一个失传了的神奇魔法，于是，我对如今的书店老板kenneth Gloss的倾慕之情一瞬间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终于在圣诞节的那天，我邂逅了ken。当我走进书店，一眼认出在收银台后面的那位花白的绅士就是ken，不禁喜出望外，向多年的朋友那样大声招呼：“Hi, Ken!”

作为家族生意，Ken生平说的第一个字便是“book”，5岁时便开始与父亲一起到书店上班，虽然他曾经想在化学领域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最终还是在1973年22岁的时候在书店开始了自己的全职工作，1985年父亲George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书店。与富有激情、行事高调、工作严格认真的父亲不同的是，Ken性格温和、为人低调，甚至都不愿为书店做任何广告。不过自小在书店耳闻目濡的Ken，与父亲一样，对图书有着不可思议的了解与热爱，在他的经营

下，布拉托书店依然稳步前进，如今成为美国最大的古董书店之一。而ken在美国古董书行业地位俨然北斗泰山，常常为各个大学、图书馆或是各种历史协会，甚至是FBI进行古董书讲座以及鉴定与估价，并常常出现在美国各种古董鉴赏活动中，如在著名的“古董巡回秀”（Antiques Roadshow）中，ken的角色就相当于马未都，为人们带来的各种古董书进行鉴定与估价。

值得一提的当然少不了这两位成功男人背后的两位伟大女人。1949年，新婚的George与Dorrit买下布拉托书店用的500美金正是Dorrit的积蓄，半个多世纪以来，Dorrit一直在这家书店工作直到2004年退休。在最后那些年，她每天都会来书店，亲手记下书店的账目。而Ken的妻子Joyce如今也是古董书专家，书店很大一部分业务由她负责，如网络销售、买书或是进行古董书鉴定与估价。

3

“‘古董秀’鉴定专家Kenneth Gloss认为这个人印刷的第一版《圣经》价值25-35百万美金。”这是2011年5月16日，美国著名的“大冒险”节目中出现一道问题，而这个用Ken作为提示的人便是1440年发明印刷机的德国人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不过，并不是每一本老《圣经》都如古登堡《圣经》那么值钱的。Ken说，书店几乎每天都能接到电话，说他们有一百年或是两

百年以上的老家庭《圣经》，而他们则不能不小心翼翼地告诉顾客，实际上这些老《圣经》几乎分文不值。在“古董巡回秀”的时候，在一个城市一天就有75本《圣经》带来要求鉴定评价。实际上，他和其他古董书专家有时进行“评估”的是将会有多少本《圣经》带到巡回秀上。

“因为《圣经》是印刷最多的书了，所以它们太常见。”ken说，“除非你的《圣经》是1456年古登堡第一次印刷的，那我确信你拥有一个无价之宝。”据报道，几年前曾经有人以超过5.5百万美金的价格卖了一本这样的《圣经》，平均每页价值2.5到5万美金。ken认为，实际上1400年代的书都非常值钱，因为那个年代的书制作精良且昂贵，当时只有精英人士才能买得起它们。不过，一本书并不会因为它们年龄越大就越值钱。“如果一本印刷于1500年代的书沉闷且无趣，你可以想象即便到现在它依然是一本沉闷无趣的书，这样的书是很难激起收藏者的兴趣的。一些人总认为他们手中的老书会很值钱，因为书页已经发黄且易碎，而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叠易碎的纸而已。”Ken说，在许多时候，书的价值其实是由它的市场需要所决定，比如说第一版的《哈利波特》，虽然只有十岁，却可以卖到3万到4万美金，这一切“取决于书本身以及收藏者的兴趣”。人们总是认为第一版图书很值钱，但实际上并不总是这样。比如说Parson Weems的《George Washington》，收藏者们最感兴趣的是第五版，因为正是在这个

版本中，作者增加了那个后来家喻户晓的樱桃树的故事。即便是同一作家的同一本首版书，其价值也要有书的品相本身决定。比如，ken的父亲George曾经买过Faulkner第一版的品相绝佳的小说《蚊群(Mosquitoes)》，一个星期后以750美金的价格卖出。而几乎同时，书店还买进了同样是这位作家的这本小说的第一版，不过却没有书皮还有一些裂缝，结果一年后才售出，仅卖了45美金。此外，作者的亲笔签名可以让一本书增值数千美金，当然，如果这个签名是《麦田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的作者J.D. Salinger的话。因为这个隐士只给非常亲近的朋友签名。而他的老乡、另一位著名作家Edward Rowe Snow的签名就不怎么值钱了，因为他的签名书实在太多了。又如老《life》杂志并不怎么值钱，但如果有Errol Flynn 或Elizabeth Taylor图片的又另当别论了。与世界各地各种古董收藏相似，古董书的发现也越来越难，但总是有新发现的。如有一本名叫《Timberlane》的小册子，尽管是一本小册子，不过它却是Edgar Allan Poe在1820年代写的第一本书。1890年代，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卖到1000美金，后来价值10000美金。大约十多年前，一位古董书商去世，他所有的收藏以每本15美金的价格售出，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Timberlane》，当时卖到198,000美金。而在2010年的一次拍卖会上，这本小册子卖到680,000美金。

不过，对于Ken来说，他的乐趣并不

在于古董书的价值，而在于收藏与发现，如他自己便珍藏了一本泰坦尼克号的宣传手册。每过一段时间，他就将自己的发现与售出的古董书或是照片、文件做成巨型招贴挂在书店中，如林肯的那张亲笔签名照片大约是三年前发现的，而那本第一版的《乱世佳人》大约是两年前发现的。而今书店收藏的年龄最大的纸头是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此书名按德文则翻译为《舍德尔世界历史》)中的一页。这本书最早1493年7月12日在纽伦堡用拉丁语出版，同年12月乔格·阿特(Georg Alt)翻译的德文版出版。当时，大约出版了1400-1500本拉丁语版本和700-1000本德语版本。而今存世的大约有400本拉丁语版本和300本德语版本。这本以《圣经》为依据、图文结合的世界历史书，是早期最出色的图文书籍之一。而Ken给这页500多岁的纸头标价230美金。不过，ken如今收藏在手的最贵的古董书价值80万美金，这是美国著名画家、博物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画册《美洲的四足动物(Quadrupeds of North America)》。虽然这套画册一部分是由他儿子完成的，部分文字则是由他亲家巴赫曼牧师写的，影响与价值比不上他早年的另一套画册《美洲鸟类》，但这部完成1848年的巨作，依然是艺术史与图书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从1849-1954年的第一版本到1870年的第四个版本，这套画册一共印

刷了大约2000套。美国政府曾将其与奥杜邦的另一套画册《美洲鸟类》作为国家礼物送给外国政府。这套画册一共三本，石板印刷手工上色，可惜的是Ken将画册收藏在自己的家中，我不仅无缘亲眼目睹美国国宝的风采，甚至因为无知也失去问ken关于他收藏的那套画册的具体情况的机会了。

4

实际上，建于1825年的布拉托书店的年龄远远比ken和他的父亲年龄大，甚至可能是如今美国年龄最大的书店之不一，因为与它同龄的书店大多已成历史。比如比布拉托书店小三岁的位于Washington街与school街交叉处的老街角书店(The Old Corner Bookstore)，在几年前已经彻底成为历史，成为波士顿著名旅游路线“自由之路”上的一站。游客只能站在转角处，听穿着殖民时期风格裙子的导游Lady介绍这栋17世纪殖民时期的红砖房子的历史。起初这里是Anne Hutchinson的房子，然而1634年因为宗教信仰她被驱逐出境；1712年Timothy Carter重新修建了这栋房子，并开设了波士顿地区最早的一家药店。1825年，这里才成为一家书店，从此成为波士顿乃至全国的一个文化地标：美国最早的杂志《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大西洋杂志(Atlantic Monthly)》都是在这里出版发行的。近两百年来，虽然这家书店

多次易手并易名，但一直是文学爱好者聚集交流的地方，一度引领美国文学风尚，

“仿若灵感会从那典雅的三角形的红墙、奇特的楼梯以及经历了两百年沧桑的裂缝中冒出来”。不过，当我寻迹而去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为一家墨西哥烧烤店，只有墙上一小块墨绿色的牌子告诉我，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老街角书店曾经所在地。

不过，站在老街角书店转角处，更令人伤感的是亲眼目睹对面书店大鳄 Borders 一点一点成为过去。来波士顿没多久，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 Borders 因收购失败，最终未能摆脱清盘停业的命运，全国几百个零售店同时进行清仓大甩卖。整整一个夏天，每个周末路过 Downtown Crossing 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举着一个 Borders 正在打折的大纸牌，纸牌上的折扣从七折五折到三折一折，直到9月最终消失了，波士顿市中心那座相当于上海书城的 Borders 书店最终成为一座空城，直到如今依然空空如也。Borders 最初不过是密歇根州安娜堡市一家旧书书店，后来开始卖新书，由于无可匹敌的图书种类逐渐成为书店大鳄，盛极之时曾挤跨不少独立书店。却不曾想，才四十岁正值壮年的 Borders 在连续五年亏损之后，最终成为历史。对此，Borders 总裁迈克·爱德华兹(Mike Edwards) 曾发表声明表示“图书行业的巨变，电子阅读器革命和经济的动荡是 Borders 走到这番田地的重要原因。”而《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数字时代连锁书店 Borders 之死》的分析更

一针见血：亚马逊等网络书店的兴起正是杀死 Borders 的元凶。在网络购书兴起的时候，Borders 不仅对顾客开架，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社区书店的特色，在书架前给孩子们搭台子定期举办故事会；此后又给读者提供沙发，继而又开上咖啡馆，提供咖啡点心；之后又提供免费的 WIFI。Borders 倒闭后，其店员们终于开口了，列出一个长长的抱怨清单，其中有两处是：“我们这儿不是托儿所。你的孩子跑来跑去撞坏了书，也撞坏了我们的心情。”“你放回一本高考参考书，我们知道你使用完毕了。这不公平：因为你知道我们这儿不是图书馆。”而今，无论那些在 Borders 书架前长大的孩子们多么怀念那些与书共度的时光，也无法挽回 Borders 的结局。虽然布拉托书店经营的是二手书和古董书，但书业的瞬息万变与艰难险阻让我不禁有些担心布拉托书店的命运。在谈起书业这一行，Ken 连连表示非常难，非常难。若不是因为布拉托书店这栋楼以及隔壁户外大卖场都是自己的产业而不用考虑房租，布拉托书店恐怕早已经成为历史，为此，Ken 倍感幸运。而电子书与网络书店的兴起，对于经营二手书与古董书的布拉托书店来说，影响并不大，因此，Ken 对书店充满信心：“至少在目前看来，书店会很好。”

如今61岁的 Ken 每一个星期都要出去三四天，到顾客家中看书买书，每个月都要买进好几千本书。这些书首先被搬进地下室，然后一一进行分类和估价，大部分二手书大多可以很快卖出去，由此可以

想见，凡是申请到布拉托书店工作的人首先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有没有在踢球的时候受过伤？你的腰背怎样？因为每个月要搬进搬出数千本书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但Ken表示，自己要活到老干到老。这不仅因为书已经融进他的生命，更因为布拉托书店就是一个奇迹。这只要看到Ken的眼神，就能懂。

X，我想你一定懂的。Q



冯翊纲

——我是一个学而知之者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liufang0815@gmail.com）

冯翊纲，台湾剧团相声瓦舍的创始人、剧作者和表演者。四十多岁，高个子，大肚皮，笑起来两条眉毛高高上拱，全无心事的样子。粉丝们常常跟着他的搭档宋少卿喊他“学长”，或者亲昵地称呼“冯伯伯”，相熟的人则喊“阿纲”、“阿纲老师”。

自从1988年，24岁的冯翊纲和21岁的宋少卿在街角公园“邂逅”，创立相声瓦舍，两人的名字就绑在一起。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怪一帅、一静一动的组合，一起说相声说了二十多年。1997年，他们的原创相声剧《相声说垮鬼子们》登台，技惊四座，从此坚持每年创作一部相声剧，每年巡演100场，几乎场场爆满。

2011年底，相声瓦舍代表剧目《东厂仅一位》来北京、上海演出，这是他们的作品第一次来到大陆。尽管冯翊纲出于种种原因，将2001年该剧首演时的内容替换了三分之二，期待已久的观众们还是反应热烈，当舞台上唱起经典段子“东厂之歌”时，台下欢腾为一片大合唱。

“观众好像自发组织起来的粉丝团，我们演得好开心。”第一场演出后，冯翊纲笑嘻嘻地说。此前他还担心现场反应不理想，反复叮嘱同台的宋少卿、黄士伟，“无论什么情况，要镇定。”

现在他则期待，以后每年甚至每季都可以来大陆演出。下一个想搬来的戏，是讲述1949海峡两岸大迁徙的《两光康乐队》。





冯翊纲本人已来大陆多次，八十年代随父返回陕西老家省亲，2002年与宋少卿拜常宝华先生为师，近年来又因在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中扮演山东人“老朱”为观众熟知。赖声川是他的另一位老师，八十年代《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在台湾首创相声剧的形式时，还在大学的冯翊纲正为表演工作坊抄写剧本，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相声瓦舍的发展方向。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已成为大学教授的冯翊纲依旧是一副天真样子：最爱孙悟空，需要莫名其妙笑一笑的时候就去翻几页《西游记》；依旧买玩具，号称随时可以开十八周的课，讲日本玩具工业与变形金刚发展史。

我骨子里还是个知识分子

你既是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你对自己的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

这两个角色是蛮拉扯的。做创作要极度严谨，才能审慎地瞻前顾后地把一个东西有组织地建构出来。可是演员又要极度奔放、调侃，甚至蔑视作者。

我们都是从演员起家，易卜生的剧本拿来看一眼，哦，我知道怎么弄。对待易卜生尚且这样，对待莎士比亚更是如此，希腊悲剧就更是一一谁知道什么希腊悲剧啊？要按我的方式演。演员都是这种态度。

演员的二度创作过程有的时候是对作者的蔑视，或者是让作者死亡。《暗恋桃花源》里就调侃这个。导演说：“我记得当时不是这个状况。”“导演，什么叫‘当时’啊，我们现在在演戏哎。”这就是对原始创作者的

调侃，有没有？

现在我身为我自己剧团的编剧，亲眼看到我的搭档调侃我的作品，不但不能阻止他们，还要欣赏他们——你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他们颠覆是不会精彩的。同时我自己还要调侃，这是一种拉扯。

我期待我同时能做到，严谨地创作，并且快乐地颠覆。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

现在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十年前的作品，你是什么评价？

多半来讲我还是不失望的。我这样形容自己，学而知之者。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先天才华的人，但是好想多做一点创意的东西。因为赖声川是我的榜样，我好想像他这样。赖声川是天才儿童啊，我不是，然后就



觉得，赖老师大我十岁，创意奔放到这种程度，我也到了他十年前创作的年纪了，我还没有像他那样写出《暗恋桃花源》。我不但还没有写出《暗恋桃花源》，他又已经写出《宝岛一村》了，这怎么得了？但是我没有把它解释为一种压力，还是作为自己的榜样，督促自己写出好东西来。

回到我自己的问题上来，因为这样，所以每一次写东西，查资料都比较勤快。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就觉得，嗯，嫩了一点，但是用功的地方自己还看得见，当时为什么这么写，那是因为查考了什么思考了什么，都有缘由，没有乱写，就觉得，好险好险。

现在还记得当年做《东厂仅一位》的由头是什么吗？

是我对姓李的那位先生不满。我们在戏台上戏称他为“皇上”嘛，他弄出各式各样好像已经改朝换代了的气氛：很明显，蒋先生的那个朝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李先生的朝代了。所以《东厂仅一位》也好，《大唐马屁精》也好，都是在讲这个。《大唐马屁精》更明显，正好讲姓李的。所以这是我对姓李的有反应，有气，是“愤青型”的一个源头。

但这次不是这样演，我作品的创作方向也在变。我不再想提起那些人——我愤怒的时候想要诋毁的那些人——因为作品可能把某些人的名字延伸地更长，某些已经过气的政客，不可以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面，免得莫名其妙延伸了他的知名度。《宝岛

一村》里面还有“李登辉这小王八蛋”这一句。《宝岛一村》是一个会被流传很久的剧本，所以永远都会被考证谁是这个“小王八蛋”。哈哈。

你们作品里面经常写到明朝。

对，因为明朝是一个中央集权，很黑暗的，而且事儿很多，这个党那个党，打来打去。所以你写起来很好利用，你根本就是讲现在，但是我们故意说，我大明朝……哈哈，太故意了。

你们的作品基本都是从历史题材出发，借古讽今，借题发挥。你一般怎么寻找合适的题材来讲你想说的话？比如《状元模拟考》





《东厂仅一位》《张飞来了》，每次都是不同朝代不同故事，怎么想到它恰好可以跟现实对照呢？

我常常拿《战国厕》当例子。有一天我坐朋友的车子，在内侧车道要左转，外侧车道突然有一辆车逼进来，我们不得不紧急刹车，两个人都踉跄一下。朋友一身冷汗，大骂一句，我就说，那开车的人比较急，所以这证明了他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要证明我比别人急，我比别人快，我比别人得大一点儿。历朝历代，我姓李的就要比姓刘的优秀一点，我姓朱的又要比姓李的强悍一点，甚至于自家兄弟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要比。

我说以前姓李的那一家啊，老二身段比较柔软，朋友满天下，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老观念，要传家给太子，老三也就因此早就依附了大哥。所以老二就靠他外面的朋友，把老大老三困死在月城里面，射死他们。朋友一愣，问，这是什么朝代的事？我说怎么我讲了半天你还没听出来这是玄武门之变啊？他说，哦，玄武门之变，我听过这个词，原来讲的是这个故事啊。

我回来之后就想，有人不知道玄武门之变，我好像应该用更简单的方法让人家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我好像也应该让人家知道什么是五胡乱华。于是这些在学校时候我被老师要求背通过的关键性名词，我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年轻人听了有反应。但是这就不能用讲历史的办法，不然就变成上课了，那我用什么办法解释历代统治呢？

我习惯在工作室跟大家扯，这时候有同事就在旁边插了一句，管屁眼啊，把人的屁眼都塞住啊，你准他拉屎的时候他才能拉屎。我说这个要在台上讲太怪了吧，然后就想到厕所，对，上厕所，你上厕所都要归我管。于是，《战国厕》！就这样。

所以一般会触动你的点是一一？

往往是一些生活中的讯息，或者我自吹自擂一下，有一种算是关心的东西，觉得别人也要知道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刚好是我可以做的，我就来做这件事。我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应当是个知识分子。

缺乏历史感的人，很快就虚空了

你说过，“我要写的不是历史，是大历史中的人。”我自己看作品的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最打动人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来我往，而是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比如《相声说跨

鬼子们》里面“煎饼果子”的段落。

你提到“煎饼果子”就太对了。台湾的症弦老师是我妈妈的老同事，我从小管他叫



舅舅。八十年代他在《联合报》的文学副刊，大三暑假时我去做实习生。有一天中午，我下来偷抽烟，之后不想马上回办公桌，就在联合报大厅吹冷气，舅舅喝醉了酒回来，脸通红，一进来看到我，说，来，坐着。

就在《联合报》大厅哦，他就在那里讲：“我出门的那天哦，我妈给我烙了个饼。同学在外面敲：‘王庆麟，王庆麟，快点啊！’‘我同学都来了，妈，我走了。’‘不行啊，我马上给你弄个饼。’‘不要罗嗦了。’我就往外走。妈赶紧烙好饼追出来，‘拿着拿着。’‘你烦啊！’我一扬手，‘啪’一声，饼掉在地上……我跟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烦啊！’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她……”说完他大哭。

他中午喝了一点酒，回来看到一个晚辈，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这些事。我整个木在那边，当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这件事就永远留在我身上。

痲弦老师这番话形成了我作品里“煎饼果子”那一段以及那一整出戏。那个暑假，我创办相声瓦舍，我开始跟宋少卿认识。痲弦舅舅知道以后，选了一篇梁实秋写跟老舍一块说相声的文章，登在《联合报》副刊。这等于是在暗暗鼓励我。我就存着那文章，想这事情我要怎么玩它。后来就有了1997年《相声说跨鬼子们》里的舒大春、梁小秋上台说相声。这酝酿了九年啊，一直不敢下手。

所以你说有些什么开端，就来自一些人的情绪，你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带了那些

情绪来，而我刚好是他那天的一个出口。这是机缘。

所以你第一次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很自然会从历史的题材切进去。

因为我的父亲那一代人是背负着大历史的线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或者说，我的出现是他们想要进行的历史正轨的岔线。我们这些人出生是意外啊。我妈妈河北人，我爸爸陕西人，他们两个如果按照正常状况是见不到面的，偏偏要海峡两岸的这个变化和机缘，他们才会在台湾相会，才会出我这个人，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赖声川





就不是，赖声川一定会出生，因为赖伯伯赖妈妈早就是夫妻了，可是冯翊纲的出生完全仰赖1949的变局啊。所以我们是历史造就出来的生命。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对历史多一点关注？

对，对与自己相关的事情，局部的也好，窄小的也好，我们要有历史的感受，要

有时间与空间的感受。这是一；第二，中文这么庞大的宝库，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在生命路途中都应该靠近它的。

你觉得缺乏历史感的人会缺乏什么东西？

我的直觉回答是，缺乏自信。因为看不到自己从哪里来，很快就虚空了，不着路线了。

要找机会多温和地谈话

听说你们下一部计划是《观纸》？那是怎样的故事？

这可能是2013年才会看到的作品。这是看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之后的一个反刍。书里有一段讲永州柳子庙，一帮河南逃难来的学生在此过夜。因为这本书的刺激，我要为柳州的那一夜写个故事。我要写唐宋八大家跑到柳子庙来拜访柳宗元——柳子庙的戏台上原来是八仙——在那一夜用那种幻觉、戏剧跟文学的调侃、浪漫营造一场梦。

也是跟现实流离的部分穿插的吧？

对，现实部分中有一个故事，也是看历史资料看到。胡适先生有非常多的红粉知

己，都是学者、思想家。我说的这位女士名字不记得了，胡适离开安徽之后，她一直留在安徽，成为教授。但是从胡适离开之后，她的时间就冻结了，她每天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适之你什么时候回来？几十年之后，老太太知道自己要走了，交待可能办理她后事的人，说把我葬在去往绩溪的路旁，适之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路过，说不定就会看见我呢。她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经去世十年，但她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是我到时候不会用真的名字。

《观纸》有一段设定，是关于《古文观止》这本书的来去。《大江大海1949》里面也提到这个故事，学生们从河南到湖南，有一个女生说我要回河南，不跟你们走了。她有一本保护得很好的《古文观止》，借给大家，你们要用书嘛，记得以后书要



还我。男同学就报告校长，校长说不容易，吩咐学生每个人抄三十篇，每个人责任背诵十五篇，就这样传抄。六十年后，这位老先生回河南老家见女同学，一本《古文观止》完璧归赵。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更有爱情味道的桥段，变成他们是一对，可能还会变成把书送回到坟头上。

这么听下来我觉得有变化，早期触发你灵感的更多是对现实的不满……

对，年轻嘛。小时候算是爱读书，现在算是把书念进来了，年纪大了，那些知识在你身上产生的反刍和浪漫，年纪大一点才会体会到那个美感。别人随便说一点什么，诶，知道哎，可以聊聊。那个美感，自己美滋滋的感觉，就会上来。所以就会进入一种真正浪漫的状态。

所以感觉上后期的作品要温和一点。

会越来越温和。其实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我父亲在三年前走了，突然之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父亲跟我讲的话，我这才发现，原来我跟我父亲一辈子没有讲过几句话。这时我才觉得，哎呀，好像应该在语言的沟通上面少一点儿看不惯，少一点儿你怎么了我、我怎么了你这类，要找机会多温和地谈话。我既然是个表演人，就从自己做起，对所有的观众采取比较温和的状态。

但是，有没有观众反馈说，最近这几年的戏不好笑了。

我无所谓。我的目标不在于让你立刻觉得好笑，因为幽默的本质不在于让你立刻好笑，humor要如何sense，这就要问你了。我在这里提出这些状态、这些内容，如果你有幽默感，它就会在你的心里打转。

那你认为最好的humor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就不可说了，默，就是无声嘛。你没有说明白，他也没有听明白，但是他会，哦噢，呵呵，你在讲这个，有会心一笑。我以《恶邻依依》为例，戏里说礼拜一到礼拜天，小矮人老大教打手枪打飞机，宋少卿在旁边有个惊恐的动作，我就说你什么态度呢，我讲打手枪打飞机，你就误导观众，观众就会误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了。但是该明白的也都明白了。我为什么讲打手枪、种草莓、捞金鱼，因为要说来台之后的国防、农业、渔业，但你非要都把他们解释成性爱关系，是我说的有问题还是你听的有问题？种草莓你们这有没有这个说法？台湾年轻人指的是在脖子上亲出吻痕，但是“种草莓”三个字什么意思，是在土地上种草莓这种植物，令其长出草莓来。那这个原本的意思怎么会出问题呢？打炮、炒饭，为什么我说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另一件事呢？这个作品的意思就在这，有幽默感的人就会明白。



听说你对《恶邻依依》最满意？

非常满意。我觉得我创意上的奔放开始了。你发觉其中有一些话题，天哪，你们这样子讲话。我在比较放松、浪漫的心情下做了这个作品，做完之后再回头看，觉得，哇，我居然敢写出这样的作品，有一点高兴。这个戏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说，不知道这里要变化到什么程度才能准我演这出戏，有那一天我就一定要来演。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希望，我也相信我们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等到

那一天，不再审批。

你为什么会这么乐观？

我在台湾出生的时候还在戒严，在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审我了。相声瓦舍1988年创立，那时候才开始没人审你的剧本。这才多久的事情？二十年前的事情。再给我二十年，我有机会还在啊。老头子，傻兮兮地来说自己四十多岁的时候写的一个剧本，色得要命。哈哈，我好期待。

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在眷村长大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很多人讲起来都不同，朱天心觉得那种自小被帖标签的状态带来对政治天然关心，也是写作最初的动力；吴念真可能会觉得重要的是五花八门的人，是讲故事的源泉与能力。不知道你是怎样？

我从很早就察觉到一件事情，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有”的年代。在眷村里面，从“无”到“有”到“多”，这件事情好明显，直摊摊摆在那边。我出生没多久后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哎哎，不要得意哦，你已经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啊。”“哎哎哎，烧热水洗澡，我们小时候可没有热水洗澡的哦。”这种话每天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所以我经常会想到，哦，我是“有”的。然后我是亲眼

看见我们是从“有”变“多”，宽裕起来了。

眷村对我的影响是：我非常知道，是的，你们以前没有，幸亏你们这么努力，从无到有，使我可以从有变多。这个所谓的无跟有，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你小时候家境是比较好的？那跟你在《宝岛一村》里扮演的角色不同。

对，是相反的。我父亲是海军陆战队，黄埔陆军官校二十六期的，他是将官，退休时候是少将。

《宝岛一村》里黄士伟演吴将军，他儿子在家里跟妈妈讲话：你管我？！你共谍的女人！其实将军的儿子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是那个德性，我刚好是那个乖一点的。我觉



得这跟我有一个很凶的妈有关，我爸平时不在家的，我跟我爸不熟。而且我们出生时爸爸还只是中校，但是他升官很快，我年纪小小他就已经是将官。我们会很得意，但是妈妈管我们很严：注意你们的态度，你爸爸是将军又不是你是将军。

但是你爸爸这么高的官衔，他对你那个时候读艺术、做表演没有意见吗？

这就是更奇特的地方，也是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地方。他甚至在我没考上的两年都不吭声，在我终于考上放榜的时候，他自己跑到榜单前面，跟我的名字拍了一张合影，非常得意。他自己没有念大学，而且他说记忆中家里面没有人碰过大学这个名词。我是第一个念大学的，更是第一个念完研究所的，嘿嘿。

那你小时候这些古书的阅读，是父亲或者母亲谁带给你的？

我父母都不是典型的念书的人，妈妈是媒体工作者，也没有能在那个战乱时代念过大学。但是他们给我小时候的玩具里面，我印象当中最好的是故事书，带着很多图画、字少的故事书。我的第一套故事书，是国字配着台湾注音符号的，叫做《100个好孩子的故事》。

呵呵，难怪你是十个将军儿子里面最乖

的一个。

不，其实我觉得这些故事很机巧，文彦博灌球、司马光砸缸、路边苦李，这多机巧啊。所以不是他们多好、多廉洁，而是脑子想得多。我认识的那些古代的中国人典范，大概都出于这样的类型。缙萦救父啊，孔融让梨啊。《东厂仅一位》里面说，融四岁，能让梨，到后来，被害死，早知道这样，就不要让梨了，哈哈。

好像你从小就是这种很感恩很知足的状态。

是，绝不能抱怨，没有资格。现在回想起来，我爸妈太棒了，他们就是放任自己的儿子，只要念书，你爱干吗干吗。天下父母如果都这样子，天下太平就会快一点。你不要让想做赛车手的人去念医学院法学院嘛，他成为赛车手才发挥他的才能。台湾现在很糟糕就在这里，可能一个打篮球的人才就消失了，可能下一个相声大师就被迫去读医学院去开刀了。

社会规范化的某一种望子成龙心态，这是中华民族的心态，就是必须要放在体制里面去，必须要放在稳定的状态里面去。他没有想到，所谓的不稳定当中，生命的线条是多么丰富。

你好像一直也比较顺风顺水，你有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没有。我就这么直白地告诉你，真的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一丝抱怨。这是我和我太太常常聊的，我说我们没有很有钱，没有那么大的办法呼风唤雨，但也没有那么多事，所以我们夫妻可以一直在一起讲讲话。赖声川那个忙法，丁乃竺都得照顾他，才能保持夫妻在一起的状态。我就说你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讲话，我们有那么多够花的钱，幸亏你喜欢的是ZARA，不是Tiffany。你喜欢ZARA就太好办了，我的收入你买点ZARA，可以的。所以太太就高兴了，太太高兴我也就高兴了。我们经常能够这样高兴，没有机会再抱怨。

很少能碰到一个人完全没遗憾，没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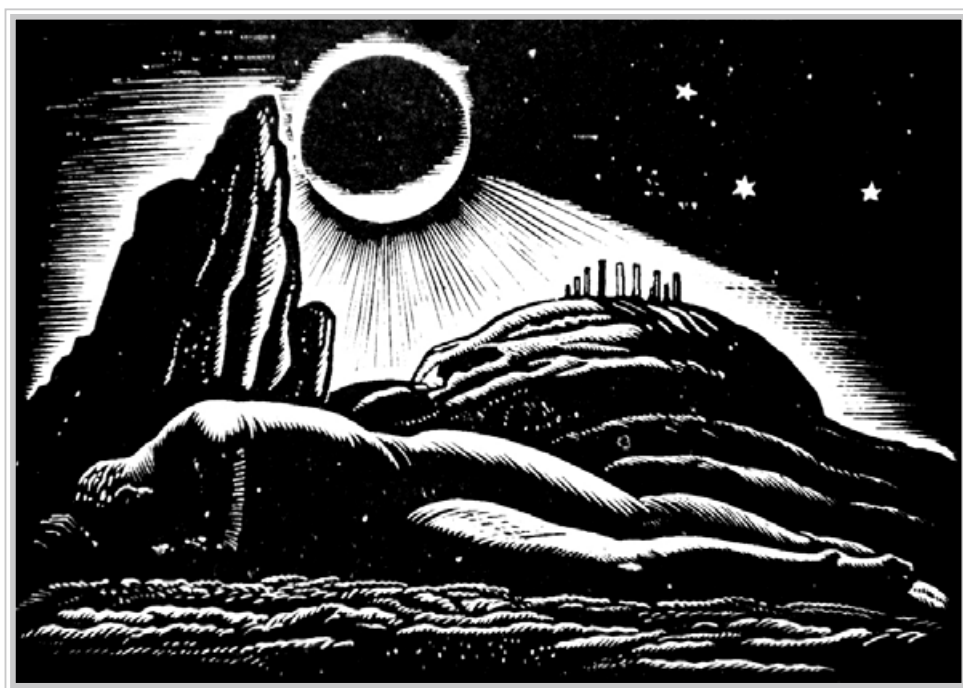
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我觉得爸爸给我的影响跟教育很重要。他是台湾国军陆战队仪队第一任队长，腰上跨一把军刀，行撒刀礼，他年轻时候的外号就是“天下第一

一刀”。这么风光的军人，晚年半身不遂，让他在轮椅上坐十年。但他脑子还那么清晰，他用单边的手写下他的回忆录，在走之前完成，印了五百本。现在我妈妈手上还有三四十本，他是一本一本送出去的！他在他有生之年了无遗憾地把书送给那些他想要他们看一看的人，当面送，同学不在了，给他太太送去。我妈每天就是陪着我爸搞这个事情，用生命最后的时间。

没有时间啊，所以人活着，生命里那一点点的幸福感，要设法把它铺得宽一点大一点。而且我做喜剧演员，编这些东西，大家听了高兴，我就高兴。

这是你一开始学表演就……？

没有那么清楚，是年纪大一点逐渐清楚的。之前还是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才华洋溢，到半腰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才华洋溢，愿意承认自己学而知之。这是一个变化。人有时候笨一点好，真的。Q



曙光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 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欢迎订阅,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 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